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領袖獨裁論

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部編印

領袖獨裁論

胡夢華著

目錄

573.07
454.5
2

改組十年·····	一一二〇
生活與政治·····	二一一—二五
黨員與政治生活·····	二六一—三二
統制人才與政治·····	三三一—三九
領袖與統制人才·····	四〇—四九
領袖獨裁論·····	五〇—七八
沙灘上的民主政治·····	七九—八七
「還政於民」·····	八八—九四
我們需要一個實際負責領導革命的領袖·····	九五—九九

975324

領袖獨裁論 目錄

二

三民主義共和國之意義……………一〇〇—一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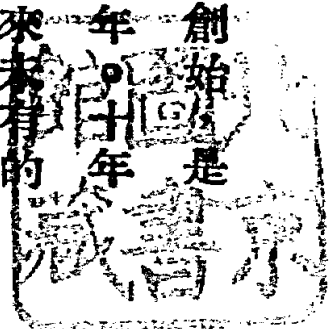
改組十年

胡夢華

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是國民黨新生命的開端，是中國新政治局面的創始。是中國革命的復興。這次改組在歷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而到現在，却好十年。十年來，由改組而產生之黨治自廣東漸及全國，完成統一大業，可說是民國以來未有的盛事。然而中間叛亂迭起，連年征戰；二十年九一八以來，日本竟強佔東北三省，今年又據榆關，佔領熱河，進攻察冀。這種變故也實在是民國空前未有的國難。國民黨人嘗津津樂道國民革命的豐功偉績，自亦不應諱言黨治下國難嚴重的責任。改組十年，成敗安在，且在這裡清算一下。

一 國民黨改組的初期

十年前的中國是北洋軍閥火併正熾的時候，混戰的結果已顯示北京政府的沒落命運。聯省自治被趙恆惕陳炯明，利用為割據的幌子以後，暴露出不合中國需要，失失了號召作用。所謂憲法，經過曹錕賄選，已不為國人重視，便連代議制度本身



，也被這般豬仔議員葬送掉了。這時候國內政治上所表現的是這樣；在權力方面是空虛散漫，在制度方面是破產失敗。社會充滿了紛亂和懷疑，在盼望着新的力量的誕生。黨治便在這樣消極的環境之下，挾着十三年改組的黨的積極精神產生了出來。

十三年的改組精神是些什麼呢？這在好談恢復十三年的改組精神的人們可告訴你許多：第一在黨的本身方面是嚴密組織、森嚴紀律，確立民主集權制的原則。這樣由中央以至黨員經過省，縣或市，區，分，四級或市，區，分，三級黨部，成立了嚴密的縱的關係。有了幹部，在指揮，訓練，活動，各方面才能運用自如，發生力量。第二在黨的活動方面是民衆運動，確立農工、容共，聯俄三大政策。因爲革命原是爲民衆的，一個革命的黨能深入民衆，領導民衆，然後黨的基礎才鞏固，而可加強力量。農工在民衆隊伍裏最佔多數而需要革命，共產黨和蘇俄那時都聲言贊助國民革命，所以爲增厚黨的革命力量起見，有農工，容共，聯俄政策。第三，在黨的政治鬥爭趨向方面是以黨治國，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開國民會議。這個

趨向正針對十餘年來北洋軍閥勾結帝國主義，利用貪污土劣宰制下的禍國殃民的多頭割據政治。所以號召起來，實施以後，更有力量。這樣在黨的本身方面，在黨的活動方面，在黨的政治鬥爭趨向方面都生出力量，並且各方面的力量萬流同匯，又生出更大的力量。談到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國民黨十三年改組還有一個主要精神，一個推動革命的基本因素。這個主要精神和基本因素便是革命力量的向心集中。力量向心集中的結果自然趨於集權，集權的結果更促進力量集中，二者互為因果，相得益彰，於是造成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居中策動，而有初期革命的勝利。

這個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的具體化便是總理以黨魁兼大元帥；實現他手訂建國大綱裏的軍政時期制度，集黨政軍三大權力於一人。這以外還訓練了一個純粹的革命武力——黃埔黨軍，為後來國民革命軍發展的基礎。所以十三年以後總理做大元帥，和民國六年他做大元帥，民國十年做非常總統，甚至民國十二年他做大元帥前後比較起來意義便完全不同，權力也不相伴。因為經過國民黨十三年改組，大家都認識了黨治的意義和軍政時期工作的精神。奉總理為中心，一切革命力量向心集中

，促成集權；其所成就自然又是一個局面。所以那時的革命環境雖依然像從前一樣惡劣，廣東一省滿是軍閥，香港政府又在一旁作祟，使盡金錢武器和陰謀來破壞革命；但是都被突破了。勾結帝國主義的商團繳械，楊劉消滅，東江肅清，兩廣統一。這都是十三年到十四年大元帥時代的事。這中間自總理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啓程北上，至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一切事都委托了代理大元帥，并且這個代理大元帥的生命還一直延到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時才取消；有許多事便是在代理大元帥時辦的。但這不是由於代理大帥個人的威望，而是勵行軍政，革命力量向心集中以後，所造成的最高的革命權力的策動。

這裏另外的一個證明還有聯俄和容共二事。聯俄和容共到後來是失敗了，但是在那時是成功的。那時總理既決定與蘇俄携手，共同奮鬥，蘇俄也決定想幫助東方民族革命，非幫助本黨不可。在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曾有提議「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用意是想限制共產黨的。當時共產黨李大釗便很誠摯地起來聲述「第三國際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係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如國民革命。」

絕對非想將國民黨化爲共產黨。其加入本黨係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非以黨團作用加入本黨。」李大釗這段話一方面可以證明革命力量的向心集中，一方面可以證明最高的革命權力已潛然形成。所以蘇俄和共產黨皆不得不贊助國民革命

二 三月二十的中山艦案

政理猶如物理，有了向心力，便有離心力。在革命力量向心集中的不久便已開始離心分散的根芽了。十五年一月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氏政治報告有這樣一段

「自去年（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總理入協和醫院以後在北京開過一次政治委員會會議，大家的意思都是主張在總理逝世以後要實行委員制的，和在廣東的政治委員的意思都是一樣。因爲總理在時在本黨有這個總理，同時在本國有這個元首；總理逝世以後再無人可繼了。而且在本黨總章第四章上面也清清楚楚說明是「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爲總理」并不是說設總理一人的。當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本黨總章草案原沒有第四章那一章的；因爲總理決心

改組本黨的意思實在要把黨的責任交付給全體同志，但大會各代表都請求總理加入第四章，就是關於總理的那一章。因為總理是有很長久的歷史的；中國的革命事業，自開始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領導，故本黨願意始終以總理為唯一之領袖。總理逝世之後，本黨不復有總理了；推之以黨治國的理論，則國家亦不復有元首了。而且就現世界來說也推委員制為比較好些。總理若在大家都願意聽他的獨裁；總理不在之後，實無人能够承繼他的。」

這一段報告闡明總理名稱之尊嚴極為得當。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本黨總章關於總理的那一章是大會代表要求加入的，足見那時革命力量向心集中的趨向，大家都希望造成一個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但「總理逝世之後本黨不復有總理了。推之以黨治國的理論，則國家亦不復有元首了。」又「總理若在，大家都願意聽他的獨裁；總理不在之後，實無人能够承繼他的。」這幾句話，實隱示這時候環境將不免破壞革命力量向心集中的原則，並潛伏了革命力量離心分散的先機了。

從此以後，革命向心力和離心力入於掙扎時期。在這個政治報告發表以後的不

久，有名的三月二十中山艦案便發生了。這案的真相至今未明白宣佈，這案的對象蔣介石先生並且聲言非等到他死不能宣佈。這案的結果是這樣：蔣先生以非常迅速的手段把海軍局長兼中山艦長拘捕，解除第一軍內共產派的各級黨代表的職務，並將軍事機關中許多蘇俄顧問解職，送回俄國。這件事的內幕顯然是共產黨要拆國民黨的台，使革命力量離心分散。但是因為蔣先生的敏捷嚴厲，處置得當，仍舊保持住了革命力量向心集中。

原來共產黨是有政治信仰和組織訓練的，他們隨時要乘火打劫，拿住機會，製造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惟恐國民黨的力量不拆散，已經在製造「左派」，「右派」的名稱，以圖挑撥離間。他們所以變了故態，悍然出此，乃因為看見總理逝世以後，沒有推定繼承的領袖，革命力量失了統率。但是同時革命力量似無統率却又有統率。商團，東江，楊劉各役造成黃埔黨軍的地位很高，已隱然形成革命的領導力量。若再經若干時日黃埔黨軍的領袖勢必成爲軍政時期的最高領袖，更形成雄厚而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則共產黨將永無投機搗亂之餘地。因此三月二十日中山艦案

便急遽發生了。這案發生時候的環境，據那時被解僱回國的俄國顧問對於第三國際的報告是這樣：

- 一、自廣東戰事勝利以後國民政府即呈鞏固之象。
 - 二、一般人民確信國民政府之有實力。
 - 三、一般人民確信黨部政策之正當。
 - 四、各個人及團體因反對而攻擊國民黨政治部政策者，均歸失敗。
 - 五、軍隊實行歸國民政府統轄。
 - 六、軍事機關之中央軍事委員會已得到統制之權力。
 - 七、各機關皆從事積極工作，以鞏固軍權之集中。
 - 八、關於建設及教育訓練等事已擬定種種之進行辦法。
- 簡言之國民革命軍，現正預備成爲一種強大勢力，不僅可以剷除各軍閥，且藉國民政府之指揮，不難進而統一中國全國。」

這是很樂觀的情形並且是先知的評斷，在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方面，不能再忍耐

，於是準備嫉視的突擊了。但是他們的企圖成了泡影，終於詫異的喊出『三月二十日，蔣氏反對俄國顧問及共產黨之舉動有如青天霹靂，使吾輩同志（俄國顧問自稱）及軍民人等爲之一驚。』

這案發生以後，俄國顧問團主席寺卡帕諾夫即主張對國民黨和蔣先生讓步。他的觀察是這樣。

「三月二十日之事或足使吾輩灰心，但吾輩當忘却此事，仍舊盡力。凡事從遠大着想，在中國人面前萬萬不可爭長；注意禮節，謹守禮貌，是爲目前最要之事。三月二十日之事，或恐再見也。尊處亦應特別注意於此。中國共產黨。已往對國民黨之「突擊政策」按今日情形，多有不當處。」

「余親聞蔣氏論述華盛頓，拿破崙及列寧等之事業，蔣氏具有革命思想，遠在其他軍人之上。竊以爲蔣氏之各種細小行爲，乃因其自尊自重之弊，不足介意。三月二十日之事之發生或者不爲無益。余贊成赫新君之言，茲事如癰疽然，將其開剖，殊爲得策。惟此癰疽中，尙有潰爛物質，無論如何，吾輩當注意治

愈之。現時自無人担保蔣氏始終爲吾輩中人，然終當利用之於國民革命。蔣氏有不依賴羣衆之特性，不應輕視。」

他們的策略是這樣：

「吾輩於此時期，造成一種不利於發生前之情勢，使蔣氏復與吾輩合作。並於吾人協助之中，使彼得到比較現時更爲偉大之權力及實力，余所擬定利用蔣氏性格，以進行國民革命事業之大略情形如此；職是之故，雖對於蔣氏之政治要求，爲幾種之讓步，以爲代價，亦無不可。上海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此間之地方委員會，皆同此見解。」

其實這時候的環境也不容他們不讓步。在前節的敘述，蘇俄顧問已把環境的關係分析清楚。他們的突擊政策失敗以後，事實上對於現狀已無能爲力，只有自己將錯就錯地讓步了。

嚴重的「三月二十」實在是國民革命的向心力對離心的示威勝利，從此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一天一天鞏固起來。所以那時廣東共產黨很多激烈地喊着要「變轉蔣

介石的三月二十日爲我們（共黨自稱）的三月二十日。」至今這個三月二十還在共產黨內被稱爲機會主義錯誤最早的一件事實。他們後來攻擊這件事的失策說

「三廿事變像我們中央（共黨自稱）所採取之退讓態度，甚止停止階級鬥爭，這是錯誤的。」

「三廿事變的教訓是什麼？是一味退讓，而不知反攻。」

托羅斯基和國際反對派更以爲

「三月二十應即與國民黨決裂，不應幫助北伐和武漢政府。」

從這許多共產黨言論去看，可見三月二十日中山艦案關係之重大。革命在廣東時期，一切事態的進展，於共產黨有利，不見得就於國民黨有害；但是三月二十中山艦案是共產黨的失敗，才是國民黨的勝利；有共產黨的退讓，才維持了革命力量向心集中。

這案以後，對立的孫文主義學會和青年軍人聯合會也同時被解散。五月十五日二屆中央二次全體會議通過整理黨務案，特列一條「保障中國國民黨綱黨章的統

一威權。』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軍權統一集中，動員北伐，節節勝利，半年之間，革命勢力遂由珠江突進至長江。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努力，益使革命力量向心集中；且使英帝國主義懾於聲勢，交還漢滬租界。但由三月二十日積下嫉恨的共產黨至此嫉恨愈甚，陰謀百出，一方想奪取革命領導權，一方想分散革命力量，於是國民黨不得已而有四月十二的清黨運動，進一步保障革命力量向心集中。

三 從四一二清黨到九一八國難

由三廿隱忍從四一二清黨運動，原是國民黨運用革命力量向心集中的好機會，因為以前有共產黨站在共產主義的立場，并且對國民黨始終抱的是獨樹一幟的態度，免不了用詭計使革命力量離心分散。現在大家都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還有什麼可分，應該有一個是高革命權力的建立了。誰知四一二以後，革命向心力和離心力的掙扎，比較三廿以後還來得更烈。原來形式上的清黨並沒有消滅共產黨遺留下的獨樹一幟的離心風氣。同時制度上和個人性格上的封建主義已開始滋長了。

東南四一二清共，而武漢到七月十五才決議分共。至八月京漢合併，突又變為

寧漢滬三個中央合組之特別委員會。這樣由兩個對立的政府到一個雜拌的政府，美其名爲大團結，實則混合集團談不到革命力量向心集中。因爲既已失去中心，且無力量，更無所謂革命，只是大家搶官做，混飯吃而已。這樣一直到十七年二月初間，二屆中央四次全體會議，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復職，革命力量始爲之一振，再由離心轉爲向心，因以完成北伐。至十七年底東三省易幟，全國統一，在表面上實爲革命力量向心集中的最好時機。

但事實上革命力量却日以離心分散，革命力量隨着領域擴大而失其集權。一般政客在唱着分治合作的學說替割據的新軍閥裝潢門面。一般官僚則急於結束軍政，開始訓政，獵取爵祿。深受封建思想和個人主義渲染的軍人便開始在他的分疆區域，掠奪財政，結合過剩人口，造成勢力，獨樹一幟，製造他自己的政治分會。如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合併之後，即有一個武漢政治分會在上遊發號施令。再看北伐成功後的情形，各地的政治分會，由其位置與管轄區域，實表示着一個勢力範圍。可憐這些政治分會的主席等在北伐時都不失爲革命元勳，而今却先後做了後此二年

中內戰的禍首。原來他們地個性裏，舊軍人的惡根性尙沒有完全消失，在他們的軍隊裏，舊軍事勢力尙沒有完全剷除，經過官僚政客從中推波助瀾，遂演成地方權力的獨立性，復回到舊軍閥的一套。在黨裏也受了同樣的分割，只有巨頭，沒有領袖，個人主義和封建思想支配下憑情感結合的小組織和派別掩蔽了革命。這樣紛亂數年，內使赤匪坐大，外招九一八奇恥大辱，東三省三千萬方里竟爲日本強佔。九一八以後欲戰不能。遷延兩年，失土未復，熱河又被攻佔。顯然的革命力量離心分散之後。必且沒落無存。

九一八事變初非偶然，日本對於中國有一個不變的原則，就是要把中國拆成幾個分散的力量。每當中國政治力量將趨於統一的時候，牠便威嚇要挾；又當中國政治力量極度分散的時候，牠便乘火打劫。拿最近的事來說，十六年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十七年五三慘案，皇姑屯案便屬於前者之例，九一八便屬於後者之例。九一八事變以前正是中國革命力量離心分散由擴大會議到非常會議的時候。連年戰爭加以這些大規模獨樹一幟的具體組織，給日本看透了中國革命力量元氣大傷，不易恢

復，且不必談向心集中；抵抗且恐不能，更不必顧慮正式作戰。時勢至此，宜乎日閱專橫，躊躇滿志。果然九一八以後中國尚須奔走團結，團結以後遷延二年，則舍本逐末、民治憲政、調高一時，長此下去且恐永無復仇雪恥之時。蓋革命力量離心分散，沒有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一切便不易有辦法，什麼民治，什麼憲政，都是空談。

四 歷史的教訓與時代的認識

改組十年，成敗如此。十年經驗給我們的教訓和指示我們的道路在前面的敘述裏已大略可見；而以往黨治的成功，革命的勝利則有二點：

第一是革命力量向心集中，造成集權的最高革命力量，

第二是鞏固軍權集中。

第一，革命力量向心集中，造成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是一種集權論，却異乎普通的集權論。權是力賦予的，是由於力量向心集中的，有力才有集權，由力到集權而後發出的力才真有力；所以要力量向心集中到集權，換句話說，集權是由衆力培

養的，集權是要大眾貢獻能力。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都是想集權的人物，但是都不免失敗了。因為他們的集權不是由衆力賦予的，而是自封的集權，個人的集權，所以便不能持久，服衆，而生出大的效率。即如十三年改組以前，總理也曾做過大元帥，非常總統，但遠不如十三年改組以後他做大元帥的集權，因為這時由全黨革命力量向心集中，貢獻能力，培養成總理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於是有初期革命的勝利。

本來以黨治國是要集權於黨，更由黨集權於黨魁。這種精神在總理死後便被本黨毀棄了。論調是這樣奇怪，這時候一般黨人相信以黨治國，而不主張要黨魁；相信以黨治國是建國的一種手段，而不承認黨魁集權是以黨治國的一種手段。蘇俄革命，列寧死了，有史達林承繼。而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則謂「總理若在大家願意聽他的獨裁，總理不在之後，實無能够繼承他的。」這樣把最高革命權力由黨魁制的總理移之於委員會議，尙曲爲解釋說是「因為總理決心改組本黨的意思實在要把黨的責任，交付給全體同志」。其實總理這個意思正是要本黨全體同志

負起革命責任，貢獻能力，使革命力量向心集中，造成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但是不要黨魁集權的風氣一經提倡，一聲『打倒獨裁』的呼聲，風靡全國。無論在什麼團體場合都不許有一個領袖，沒有一個中心信仰。從十五年到現在，六七年中一般社會是這樣在離心分散的狀態中。

黨魁在黨裏的需要是絕對的，這是一般政黨的通則，不必細說。所謂集權或獨裁應該是黨的集權，革命的集權，而異於個人集權或專制集權。因為個人集權或專制集權是自私的，是封建的；革命的集權或黨的集權是革命力量向心的，是有社會性的，在上面有革命的最高原則——主義，政綱——總理的全部遺著做範疇。在下面有黨的幹部，黨員，民衆三者的行動擁戴。本黨十三年改組精神表現於黨的本身者為嚴密組織，森嚴紀律，表現於黨的活動者為民衆運動，容共聯俄，前已言之，茲二者的目的便是要促成革命力量向心集中。我們有了這個歷史的教訓，便該認清一個領袖，努力貢獻我們的能力，使革命力量向心集中，造成他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

第二 鞏固軍權集中是時代的要求。革命力量向心集中在組織方面要造成一個

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在革命的進行階段方面，依建國大綱的程序，建國之初便須勵行軍政，鞏固軍權集中。十年來，惟有這一點在革命初期是完全勝利了。

軍權集中的具體化在先爲大元帥，在後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無論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嫉視革命軍事領袖，即至三月二十中山艦案以後，他們的報告也以爲軍權集中是必要的。無論他們怎樣喊着「打倒軍事獨裁」，但是在總司令指揮下，北伐才得完成。但是軍政沒有被共產黨「打倒軍事獨裁」的口號所中傷，却見厄於早產的訓政。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的劃分總理規定得原甚詳明。不幸訓政的名稱被人視爲點綴昇平的美詞，訓政制度被人用爲獵取高官的工具，軍政時期的工作尙未完成，便一步跨到訓政；間接影響到革命力量向心集中。

軍政時期的工作，依建國大綱的規定是：「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一統。」這裏所謂兵力應該是革命的武力，但事實上不盡如此。國民革命軍在真正隊伍本來有限，不幸在湖北江西的戰役又損失大半，策略上，不得不引進

一般與三民主義共鳴的軍隊，以共同打倒軍閥；而各地的軍人因北伐的進展，歸順國民革命軍的也爲數不少。這些軍隊需要黨的主義訓練，使成黨化。但是因爲軍政結束太快，這些工作沒有來得及做；而各地政治分會管轄下的軍隊封建意識復萌，復爲破壞國家統一的障礙。十六年八七南昌暴動，一二一一廣州暴動以後的赤匪蔓延，又形成國民革命的對象。這許多事實都指向一個軍權集中的革命武力再來一個軍政時期。

九一八以後，華北事實上已入於軍事狀態。東北在炮火攻擊下被日本帝國主義佔了去，將來自仍須在炮火反攻下，向日本帝國主義奪回來。復仇雪恥，收復失土，必待戰爭。中日國際戰爭正式爆發之日，即全國總動員之時。現在長期抵抗中便須『作內政而寄軍令』，內以肅清赤匪，外以準備抗日決戰。按之本黨十三年改組時所決定的政治鬥爭趨向是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開國民會議。則國內軍事告終之際便須緊接對外武力抗爭的準備。革命政權的樹立，尤其是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革命政權的樹立必須對外有力作戰，遠之如美洲合衆國對英獨立，必須軍權集中於

華盛頓，近之如新土耳其革命必須軍權集中於凱末爾。惟美人與土人深知開國必須武功，所以能信賴他們的革命的軍事領袖，托以國事，付以軍治，才有開國之成功。我們應該有這個時代的認識，集中我們的意志，一致鞏固軍權集中。

五 我們的陣容

改組十年，事變紛繁；不遑細論。十年前之時適逢中國軍閥火併正熾，十年後今日正當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矛盾尖銳化。年黨應及時努力，改正錯誤，重新整飭革命力量，復興十三年改組的精神，以十年前開始對軍閥的陣容來對日本帝國主義，長期奮鬥，當不難復仇雪恥，爭取民族獨立之自由。

我們的陣容在積極方面是全黨同志全國人民貢獻能力促成革命力量向心集中，擁戴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領袖。全黨同志人民集中意志，一致鞏固軍權集中。在消極方面是：制裁破壞統一，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和封建思想的割據政治。槍殺一般掛撥離間，營私搗亂，不顧民族利益的政客。

這是歷史教訓和時代認識應有的主張。我們現在把他提出來作為本黨改組十年紀念的禮物，以復興革命。

二十二，三，十一於北平。

生活與政治

在文學園地裏，有爲人生的藝術和爲藝術的藝術二大派別，但若把自然也看做人生的一部份，這樣地把人生的範圍加以放大，則人生與文學的關係更爲密切。所以多數人生意見以爲文學是代表人生的，因之文學與生活的關係便成爲不可離了；並且有充實的生活才有優美的文學，一個人嘗遍生活滋味，才能成功一個作家，而在某一種條件生活的作家則成爲某種條件生活下的學派作家。這個道理在政治疆域裏是一樣的正確。那便是說，有充實的生活才有優良的政治，一個人把握住生活的真義，才能成功一個政治家，而在某種條件生活下的政治家，則必爲某種條件生活下的黨派政治家。——一代作家和政治家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所以儘管一般盧布哈叭在上海大作其普羅文學，我人敢斷言普羅作家還在吃乳，現在一般人志於普羅作家必然失敗，這個理由便是他們的生活不充實。轉變後的魯迅只能寫雜感譯書，郭沫若也只有埋頭譯書，甚至轉向考古，轉變了葉靈鳳又轉變了回來，即使一般人都

認爲成功了的矛盾也只是浪漫學派的支流自然主義作家。而從九尾龜的作者到郁達夫張資平是變換了性的享樂的敘述，即時髦到孤步舞的悲哀素描，依然是在一個同樣的病態社會。這種社會產生不了普羅作家，也產生不了民族文學作家。同樣，這種同樣的政治家也不會有的。這是革命後的悲哀。這個事實告訴我們這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生活沒有進步。

我們不存奢望，我們只有一個起碼要求，在政治方面要由廉潔到全民政治，那便是先需要一個廉潔的政治生活環境。我們不願厚責一般人在西湖造別墅，在北極閣起洋樓；富貴何足計，他們的生活早已斷送了他們政治上的成就。他們可以再富再，但是時代的政治家是和他們絕緣了。然而有一個消息却令我們非常難過：我們聽說中央委員皆有搭列車，乘輪船不付半文錢的權利。據說辦法是這樣：每個中央委員有一枚證，上嵌這位委員本人的像片，憑這個像片便可搭任何頭等車，乘任何頭等艙，並可帶隨從一人，到任何地方，不付代價。又聽說首都荐任以上公務員來往京滬有月季優待券。這是革命賦予革命者的權利麼？我們不知道他們憑什麼要享

受這不該享受的權利。這不僅使國家財政和法律遭受損失，並且表示中央以至革命的最高幹部整個的並不嚴厲拒絕貪污政治。這結果是什麼呢，——政客生活的培養，荒淫生活的增加，九尾龜的作者以至孤步舞的悲哀素描者速度產生。

生活與政治是不能分離的，而革命者尤當注意生活的正規把握。假若生活是粉紅色的，而希望政治是青白色的，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我們常大言不慚的要効法戰後土耳其的復興，我們要有一個凱末爾，我們尤要有一個安哥拉，——這個意思是，要有一個安哥拉的生活環邊。越王勾踐便是在這種同樣的環境裡實行臥薪嘗膽的。我們嘗有一個矯枉過正的主張——我們曾呪咀都市，可呪咀的中國沿海瀕江的都市，只是中國農業經濟和固有道德的摧殘者，只是替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和中國買辦資產階級造利益。所以在民族資本方面，在羣衆生活方面，在民生主義的社會革命方面，中國現有的都市是應當改造的。易言之，中國大多數勞苦農工大衆不需要這種都市生活，而站在反帝的立場，尤當改造這種都市，重新建築我們自己需要的都市。因為現在這種都市是憑藉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突然起來的，並不像歐洲產業革命

時代逐漸生長的(Growing)。這種都市沒有生產，只有消費，供給人們享樂。自九一八至熱河的放棄，報紙上競登着義勇軍在水深火熱之中，冰天雪地之內拼命殺敵的消息，但是儘有義勇軍的領袖和指揮却倘佯於幾千里外的平津，假借報告軍情，招待記者，籌款募捐等漂亮名義優哉遊哉度其太平歲月。這是什麼緣故？這是粉紅色的都市享樂生活膠住了他們的活動，磨滅了他們的奮鬥意志。是這種粉紅色的都市享樂生活使東三省不抵抗而棄，是這種粉紅色的都市享樂生活使熱河不戰而失，是這種粉紅色的都市享樂生活使平津危殆，終於屈服成立城下之盟，塘沽協定。但是假若我們這樣苛刻痛責他人，不如反叩革命的馬高幹部何以接受近於貪污政治的享受？孫科氏嘗痛斥黨員為特殊階級的『八旗子弟』，多數黨員初頗詫異其意何的。今若此，孫科氏之言似不為無的放矢。我們的最高革命幹部不該蒙此不名譽之詬，我們的凱末爾應不屑要此最高革命幹部，而我們的革命同志也決不願推戴此最高革命幹部。

生活是可以左右政治的；而政治也可左右生活。當生活和政治的現象矛盾時，

便須以政治者的人格定二者之轉移，這便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遭遇的嚴重問題了。我們時代的生活已被貪污土劣糟踏不堪，而我們的政治理想不僅是廉潔的，並且還要全民的。我們在這種衝突的環境中，要走向理想的廉潔政治，全民政治，需要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領導着一般同氣的政治者，以他們的人格去改造頹廢的生活，指導並管理成員的生活。所以這個時代需要一個唯一領袖，一個唯一的集權領袖。這個領袖對於時代的生活和政治負有轉變的任務。他要使目前頹廢的生活振作起來，把貪污的生活剷除乾盡，由廉潔生活到廉潔社會，由廉潔政治到全民政治，他的任務才算完成。

二十二，八，十七，於北平。

黨員與政治生活

政治是每一個公民或生產者應該過問的，尤其是一個政黨黨員。假若認定生活和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甚至以為生活是政治的中心，那末一個政黨的黨員便是依共同的政治主張的政治生活者。一個黨員和普通公民或生產者一樣應該有專門職業技能，而一個黨員之異於普通公民或生產者則在私生活以外，另有依其政治主張的政治生活。嚴格點說，一個黨員應該以政治為生命，而在某種場合之下，因為要充實黨的生命和力量，一個黨員的私生活且須受政治生活的支配，那便是說他的專門職業技能應隨時隨地發生政治生活的作用，甚至依政治生活而加以改變。這樣，一個黨員的意志和私生活在政治生活範圍和管理之下，便是我人常稱道的『只有黨的自由，沒有黨員的自由』。這是一個政黨成功必具的條件；而以一黨專政或以黨治國為目標的政黨尤須有這種絕對條件才不致失敗。是在這種條件之下法西斯蒂成功於意大利和日耳曼，是在這種條件之下布爾雪維克成功於蘇俄；而因為忽略了這一條

件，現在中國革命才不免流產。所以在目前復興中國革命和復興中國國民黨的呼聲高唱入雲的時候，培植黨員的政治生活是一件基本重要的工作。

政治生活是現代的事業並具有絕對現代的意義的；雖然政治生活四字在一般人的概念中，未必如此。在中國，過去有議員，有政客，有官僚，他們對人都說是過的政治生活；有時我人讀到偉人的傳記，常見有從事政治生活者若干年一類的字句。這些所謂「政治生活」便是一般人概念中的政治生活定義的根據；但是只能說是一個議員，政客或官僚的生活，或一個大政治家的生活。而現代的政治生活是具有團體性和為政治主張而奮鬥的意義的。具體的說，在一個黨的領袖指揮下，以組織的力量，分工合作，為政治主張而奮鬥，以期把握住現實政治，是為政治生活。在這個含義下，可以找出下列幾個原則：

1. 黨員是為政治而存在的，離開了政治，便失却其為黨員。政黨是在政治之下活動的，拋棄了政治，便不是政黨。
2. 黨員應努力把握現實政治，忘記了努力或不去努力，不能成為黨員。政黨應

努力把握住政權，把握住以後，若予以拋棄或出讓，是自壞其政黨生命。

3. 黨員的政治活動要相應於其政治主張，不能出於政黨的立場，不能違背政黨領袖的指揮；所以政黨的進退是負責任而一致的。

有這樣黨員的政治生活才能成政黨的生命。反之，政黨生命的沒落一定是黨員政治生活沒有培養成功。這便是目前中國國民黨所遭遇的嚴重問題了。

x

x

x

x

因為招牌打的是『以黨治國』，口號喊的是『黨權高於一切』，於在因果律倒置之下，錯誤的把牠解釋為『黨高於一切』，國民黨便變為超政治的；因而離開了政治的圈，失却了政黨是在政治之下活動的意義，而一般黨員也忘記了為政治而存在。由這種畸形意識形成畸形狀態，於是黨部成了特殊機關，黨員成了特殊階級，辦黨成了特殊事業。而自辦黨成爲特殊事業，黨便外於社會成爲遺世獨立的機體。從此黨是黨，政治是政治，二者不相侔。黨員的能力和慾望不向政治施展，却在黨內迴旋，以致黨內多事；而名雖以黨治國，政治實權却付諸官僚政客。這是沒有弄

清黨員和政治及政黨和政治的密切聯繫所致。所以目前要復興中國國民黨，便先要黨員認識黨是在政治圈內，黨是黨員政治生活的組織，這便是要喚起黨員的政治意識。

政治生活的嚴格意義不僅是在野活動，而是要在朝把握政權，說到這個問題，又聯到「以黨治國」了。有人把「以黨治國」解釋爲以黨義治國或以三民主義治國，而不必是黨員治國，這個解釋似乎滑稽而矛盾，治國二字看來似乎題目甚大，其實就是參加實際政治的意思。以黨來代替個人參加實際政治，就「黨」的字面來解釋，以黨治國應該是依共同政治主張的黨員來治國。當日之初，黨的領袖或幹部吸收黨員或黨員加盟入黨都爲的是參加實際政治，則在以黨治國時期，黨員更須當仁不讓。若以爲在黨義或三民主義治國前提下，可以容納非黨員而同情於主義者參加政治，則仍爲個人主義的英雄政治，而非現代化的政黨政治。政黨政治而無需乎黨員參加，請問要黨員何用，而組黨之意義又何在？關於這個問題有人解答說黨的工作在使人民知，故重在宣傳。這在擴大黨的組織，吸收新的份子，並取得民衆的信

仰和擁護，自當由宣傳入手，而黨的重要工作還須把握政權。又有人主張黨員應該參加社會事業。黨員原是社會一份子的公民或生產者，他應該依其專門職業技能而參加一種社會事業。但是他既由公民或生產者加盟為黨員，並常為政治活動。現在有許多黨員未能從事社會事業，那是黨登記黨員時未曾在質上加以選擇，或黨對於黨員私生活管理指導未善所致。現為補救計，一方面固當提倡黨員的社會事業；另一方面斷不可抹殺黨員的政治活動。目前國民黨訓政的失敗很顯然的是多數黨員沒有把握住政權，以致政權被官僚政客弄不得堪，而黨與黨員都代人受過。所以目前要復興中國國民黨，應該由黨員的把握政治以充實政治的把握政權。這便是要提倡黨員的政治活動。

說到黨員的政治活動在國民黨裡不是沒有的，但不幸離開了政治主張，變成個人主義的升官發財鬥爭。只要能升官發財，他們可以離開國民黨的立場，來迎合一般人的心理，悅衆媚時。所以他們有的是自毀立場，有的是忘却自己立場。有的是另站立場，他們一羣是一致毀黨的。這些把戲的例子，可以從二屆粵委到四屆西南

執行部一串之羣裏去找。幾年以來鬧着精誠團結，隨團隨分，隨結隨散；便是沒有依政治主張做精誠團結的根據，所以政治活動必須以政治主張為樞紐，行動要集中而一貫；這便需要一個黨的領袖做總指揮。他是黨的政治主張最高保障者，這樣黨員的政治活動才能協調一致，而政黨的行動才是整個的和負責任的。目前要復興中國國民黨，便先要黨員的政治活動和政治主張符合。這便要統制黨員的政治行動。

×

×

×

×

由喚起黨員的政治意識，到提倡黨員的政治活動，到統制黨員的政治行動，這樣有計劃的培植黨員的政治生活，才可以把握政權，才談得上『以黨治國』。現在一般人覺得國民黨目前最要的工作是開放政權。黨是黨員的黨，然而現在國民黨一般黨員與政治有什麼關係？這樣說來，開放政權豈不滑稽可笑！所以站在一個黨員的立場，現在不但是不該理那開放政權一套廢話，還該要把握政權，參加政治。把握政權和參加政治是一個黨員對於黨隨時隨地應有的努力和貢獻，而主張以黨治國的國民黨尤應該如此。目下一般注意到復興國民黨問題的人，不但要擁護一位忠實

肯幹的黨魁，嚴密黨的組織，還須鼓勵黨員的政治興味，培植黨員的政治生活。要每一個黨員過問政治，參加政治，把握政權，這樣黨才有生命和發展，而政治也因政黨的活動得着改進。沒有政治熱忱的黨員便不配參加政黨，在一個黨內，多數黨員沒有政治熱忱，便失其政黨的作用。所以一個黨員應該在政治生活裏。

統制人才與政治

政治事業發展到現代，擔當政治的責任或義務顯然已擱在政黨的肩上；所以我人主張有計劃的培植黨員的政治生活，由喚起黨員的政治意識，到提倡黨員的政治活動，到統制黨員的政治行動，然後才可以把握政權，才談得上「以黨治國」。這便聯繫到人才與政治的關係了。在官僚政治的場合，政治的昌明由於賢人，在政黨政治的場合，政治的昌明由於統制人才。上軌道的政治一定是合於時代需要的政黨以統制人才在經營着。而統制人才的成功與失敗便成了一個政黨的幸運和厄運的最後關鍵，雖然這個政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已被公認為合宜。

政黨政治在中國不過是近幾年的事。過去幾千年一脈相承的中國政治是士大夫社會層的官僚政治，牠的理想是賢人政治，牠的理想組織是好人政府。所謂士大夫社會層有兩種特殊的質素：一為富有身分的信仰，一為憧憬權利的追求；所以他們的口號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這兩句口號循環的實際體驗便是他們身分

和權的不斷培植；自由主義者，由這樣的培植便十足形成他們士大夫社會層的官僚生活，維持了幾千年以來自由主義的官僚政治。直到黨軍北伐成功，中國政治才穿上政黨政治的外套，掛出「以黨治國」的招牌。「以黨治國」，是怎樣的呢？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曾規定有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革命時期，謹按其含義，可分爲兩截：牠的前半截意義是！

「以黨的力量，推進革命羣衆，破壞不合時宜的生產組織和社會制度」。

牠的後半截意義是！

「以黨的力量推進革命羣衆，破壞不合時宜的生產組織和社會制度」。

牠的後半截意義是！

「以黨的力量，領導革命羣衆，建設合於時宜的生產組織和社會制度」。

簡括言之國民黨要以黨治國便要兼顧建設和破壞兩種工作；這便是在有了主義，政綱，政策，和黨的組織以後，還須有破壞和建設的統制人才了。所謂「以黨的力量」便是主義，政綱，政策和黨的組織加統制人才；而統制人才實爲這個力量的

司機者。因為統制人才的失敗遂使黨治遭逢厄運，而不能上軌道；破壞既不徹底，建設更少成效。因為統制人才的失敗不僅使這幾年的中國政治辦不到革命政黨的『以黨治國』，便連普通政黨政治的規模都沒有，實際上仍是幾千年來，一脈相承的自由主義者士大夫社會層的官僚政治。因為黨的統治人才失敗，革命勢力進展到武漢，政治上的人才無以為繼，沒法補充，於是共產黨乘火打劫，霸佔政權，致有十五六年間武漢政府的左傾幼稚病。因為黨的統制人才失敗，革命勢力進展到南京，政治上的人才無以為繼，沒法補充，於是官僚政客賣身投靠，竊據政權，致有十七年到現在南京政府的不滿人意。說到這裏，或許有人以為國民黨不是沒有人才，身為黨員或掛名黨員參加政治者也不在少數，何以黨治失敗如此？這個問題正好把我們的理論引到統治人才與普通人才區別上面。在政治的場合以及任何場合，統治人才的補充和普通人才的補充效果是絕對不同的。前者是集團主義的，後者是個人主義的。用集團主義統制人才來參加政治，對於舊有勢力在包圍的總攻擊中，可以有征服的把握。用個人主義的普通人才來插入政治，對於舊有勢力在各個被擊破的原

則下，只有屈服和投降。是這樣一般黨員沿着個人主義的路綫插入政治，終於衍變為自由主義者士大夫社會層的官僚，這結果是黨員個人的升官發財，而黨的主義，政綱，政策遂失其實現的保障。這是我人對於革命以來，政治失敗原因的分析。

本來以黨治國需要的是「統制」，一切都應該在「統制」的法則下推進着，而以行動為生命的革命政黨尤需要統制人才。依上節所述，在積極方面，統制人才可以保障黨的主義，政綱，政策的實現，在消極方面，統制人才可以斬斷自由主義者士大夫階級官僚政治的連續。但統治人才的最大價值還在牠是一個直接與各個個人有關的代議制度。莫索里尼曾說過：

「目前代議制的方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直接與各個個人有關的代議制度」。

這幾句話可以引英儒柯爾 G. D. Coles 的話來做註腳：

「沒有可以代表別人，沒有人的意志可以用別人的意志來代替或代表」。
「真正的代表如同真正的團體一樣是特別的，不是普通的：是分職的，不

是包辦的。所代表的不是個人，乃是各團體的公共意志。那種根據個人可以完全被人代表的見解而來的代議政體是錯誤的學說，破壞個人的權利，撲滅社會的福利。」

莫索里尼自己下的注腳更爲透澈：

「法西斯主義不只反對社會主義。同樣牠也反對所謂民主制度——不論是這種制度的理論的前提，或是實際的應用。法西斯主義不承認，多數僅以其爲多數，便能支配整個人類的社會：法西斯主義寧願主張，在人類中實存有平等之事實，而這種不平等也決不是單單用一些普選制之類的機械方法便可消除的。民主制度時使民衆做着統治之迷夢但是真實的統治權則始終是在暗中被一些不負責任的勢力給操縱着的。德謨克拉西名義上是一種不要君主的制度，但在實際上，牠却有好多的君主，並且這些君主的殘暴和專制實際上更有過於舊日的暴君。」

說到這裏，應該是怎樣一個結論呢？這仍讓莫索里尼來說：

「政治理論是有時代性的，而人類則為永存的。我們可以斷然說，本世紀乃是一個權力的世紀，左傾的世紀，法西斯主義的世紀。假使十九世紀是一個個人主義的世紀，我們可以說本世紀是一個集團主義的世紀，國家的世紀。」那末包括在這個集團主義下的統制人才何以見得是一個直接與各個個人有關的代議制度呢？這個註腳可以去找總理孫中山先生兩句名言：「政府要有能」、「人生要以服務為目的」。以「有能」和「服務」兩種質素織成的人才，經過計劃的鍛鍊，在集權的統治力量支配下，為達到國家民族的福利而總動員地奮鬥犧牲，這便是統制人才的真實意義；而這種統制人才既是為國家民族的，當然不啻是直接各與個個人有關的代議制度了。

黨治和革命的失敗顯然因為忽略了統制人才，所以國家民族建設不起來，黨的主義，政綱，政策不能實現，官僚政治依然橫行。因為零碎的幹不能擊破整個的舊勢力，散漫的幹不能打敗已形成的舊勢力；豈止不能，並且還要被舊勢力同化。在這樣局面之下，談不到政治改造，我人可以大胆說一句：中國政治要有改造須在統

制人才以後，目前空言政治改造只是緣木求魚；始終跳不出官僚政治的窠臼。然則統制人才將如何去計劃並如何去策動？這便要需一個集權的統治力量來支配；依現代政治事業由政黨來擔當責任和義務來說，那便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黨魁主持一切。問題至此，一般熱心中國政治改造運動的人在檢閱國內現成政黨的力量以後，對於國民黨應抱一個什麼態度？又在觀察國民黨現狀以後，對於國民黨的改造運動，黨魁運動應抱一個什麼態度？在決定這兩個態度以前，還請注意這已不是一個個人主義的世紀，而是一個集團主義的世紀。

二十二，九，二十五於北平。

領袖與統制人才

胡夢華

時代需要一個領袖是無疑的。但是在德謨克拉西潮流以後的領袖應該異於古昔的英雄主義。（雖然這個名詞現在也通用）。當所謂民主革命推翻了專制政治取而代之以後，領袖獨裁的產生決不是帝王專制的復活。這是領袖運動進程中應該認識的。時代已變遷了；盲目地稱頌天王聖明和糊塗地喊着打倒獨裁是一樣錯誤，僭號自娛地稱孤道寡和欺騙民衆的偽民主是一樣不合時宜。那末時代的領袖是怎樣地一個人呢？時代的領袖應該是一個政黨的黨魁，那便是說由政黨的黨魁到時代的領袖，這樣地一個時代的領袖在上面有主義和政綱政策的範疇，在下面有黨的統制人才的幫助和民衆的擁戴。他是一個有組織的，集權的德謨克拉西的代表；他有統制人才做他的事業基礎。

這好像是一種「人治」論，一般主張法治的人們，尤其是染了資本主義德謨克拉西的法治論者許要架起「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和「制度」或「法」兩個砲壘來射

擊。這種射擊在歷史上原有相當理由和例證的根據的。但即謂此爲人治亦決不同於傳統的人治。『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是傳統的人治的致命傷；因爲這種人是個人主義的人，個人既亡，事業隨之，即偶有廢績也只是個人主義的『蕭規曹隨』，不久即滅。這是因爲沒有統制人才的基礎。再看『蕭規曹隨』而後，無以爲繼，則法治論者的『制度』或『法』，『規』若不得其人，亦不盡可恃。時代需要適用的制度，更需要傑出的人才來革新或創造制度，尤其需要有組織和訓練的人才來推行制度。本來政治事業發展到現代，人才和制度的關係已密切到不易分離。制度的內容包括人才的統制，而人才的統制也就含有『制度的』意味並受制度的範圍。所以統制人才是制度的重心，有統制人才的集團爲時代而勞動，鬥爭，創造，決不因一二人亡而廢棄了集團對於時代未完成的使命和應有的努力。若謂此爲人治，實已具有強度的法治化。這種強度法制化的人治重心在領袖與統制人才的聯繫。

領袖與統制人才的聯繫是現代政治上領袖取得民衆信仰的一種重要技術。領袖對於國家民族和政黨的忠實在能奉行主義、政綱，政策。領袖對於民衆的信仰在能

實現主義，政綱，政策。而如何使能奉行和實現主義，政綱，政策。則在領袖用人的腕力，所以需要統制人才。治國如行船；主義，政綱，政策是指南針，領袖是船主或引港，統領人才是全體船員水手，船主或引港遵照指南針，策動全體船員水手協力工作，然後乘客乃信賴之而搭其船以赴目的地。指南針之準確與船主或引港之智慧必須全體船員水手勞作而後獲得乘客之信賴；反之，船員水手罷工，航行遂不得不停。有成績而後有信譽；主義，政綱，政策縱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只能獲得民衆對於知的或靜的信仰。領袖指揮統制人才勞作才能獲得民衆對於行的或動的信仰。統制人才以行動溝通主義，政綱，政策和民衆二者的結合，造成領袖的事業基礎，由事業的成績和信譽獲得民衆的信仰，才是真正的民衆基礎。

領袖不能是光桿，然而領袖怎樣才能免爲光桿呢？光桿的反面是民衆，然而有了民衆，領袖仍不免是光桿。這裏有一種事實：有些自命爲領袖的份子嘗以民衆運動自豪，民主政治騙人；他們嘗得意地說「代表民主勢力」，「領導民衆」，「我有民衆若千」，「我有民衆擁護」結果他們是一個民衆也沒有，甚至衆叛親離。因爲沒

有統制人才的事業基礎做領袖和民衆的結合媒介，所以他們縱能欺騙民衆一時，不能敷衍民衆長久。這種自命爲領袖的野心份子好像有民衆，在某一剎那間也確有若干民衆，但結果是一個光桿。所以民衆運動要以統制人才的事業爲中心，然後民衆運動才能結實成民衆基礎。又有一種情形，確有許多民衆對於領袖很有信仰，但是造不起民衆基礎。這不是領袖的資望問題或民衆的信仰程度問題，而是因爲領袖和民衆的中間缺少有力的組織的維繫，這個維繫便是統制人才的事業。因爲資望和信仰建築在事業上才結實堅固，而事業待人乃舉。各種社會層的事業需要各種社會層的人才。由各種社會層統制人才的領導，建築各種社會層的民衆運動，結實成民衆基礎，乃完成領袖的整個民衆基礎。

但是領袖有了人才何以還不能造成事業基礎和民衆基礎呢？——這便是普通人才不及統制人才有效率的地方了。人才要有統制才不至濫費，衝突，而可各得其用，用得其宜。史稱漢初三傑蕭何，張良，韓信分掌政治，機密，軍事；因此一點統制人才的雛形遂成就了劉邦的一統江山。但劉邦之於蕭何，張良，韓信，並不能

用來做現代領袖與統制人才的代表解釋。現代領袖與統制人才的聯繫在事業——民族復興和革命的事業，而不是帝王和王佐的事業。同此目的，先求行動的統制必先求觀念和生活的統制，這是領袖對於統制人才要負責任的。由統制的觀念和生活進而為統制的行動，在領袖的指揮下。完成民族復興革命大業，這是統制人才對於領袖要負責的。

時代需要的統制觀念和生活是怎樣呢？這應該根據現實來解答，因為離開現實，無論人世或靈魂的一切都不能存在。現實告訴我們次殖民地中國唯一的要求是民族獨立，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存為的是民族獨立。在這個前提下，個人慾望應該為民族獨立運動而縮小。個人的努力應該為民族獨立運動而放大。這是現代集權主義對自由主義，集團主義對個人主義，獨裁對民主的勝利。這種觀念生活者的生存價值在能把這種觀念具體化為行動。但怎樣去培植這種行動呢？孫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

「人生要以服務為目的」

那便是說

『生活是一種奮鬥，每一個人首先克制自己，鍛鍊自己爲一個有價值的工具，足以服務自身，服務人羣。』

『生命觀是嚴肅刻苦的宗教，最反對安樂與妥協。』

『無論怎樣個人生活不能特殊別於一個國家。他對於國家有應負之義務：這種義務的實行就是所謂的「犧牲」，包括我們的生命在裏面。至上美德就是非常的義務。』

『生活是應該高尚而充實的；牠爲其自身而存在，且尤爲其他一切同時的人們以及未來的人們而存在。』

這種以服務爲目的的人生不是消極的，被動的，而是積極的，自動的；尤其是對於政治的態度。所以

『一種理論一定不要止於玩弄言辭，而必須還是一種活潑的行動；並要有實用主義的精神，同時也具征取生存和征取權力之意志，以及在殘暴現實之前，保

持着穩固的戰綫。』

「當政權繼承公開之際，我們必須甘心爲政權而奮鬥。當現存政權傾覆之際，我們必須立即取其位而代之。」

領袖和統制人才的結合應該以上述的統制觀念和生活爲基礎，領袖選擇人才依上述的統制觀念和生活爲標準才是統制人才，領袖的基礎建築在這種統制人才上面才可以成功，而不致失敗。領袖的責任在有這種選擇的認識並以行動的毅力爲以身作則的訓練，由計劃的配備進行組織，完成技術統治（Technology）使人才各得其用，用得其宜，才不至，濫費，衝突。這樣有了「革命的尺寸」，認尺不認人，不以個人喜怒恩怨定人才的去取，才可以使人才集中，才可以使領袖集權發生效率。因爲權時能力賦予的，是由於力量向心集中的。有能力才有集權，由能力到集權，而後發出來的力才真有力，所以要力量向心集中到集權。這種集權不是個人或專制的，而是人才賦予的，培養的。由事業信譽獲得民衆基礎的統制人才便是民衆意志的集中表現，建築在統制人才基礎上的領袖，又是統制人才意志的集中表現，這

樣可以證明人才賦予和培養的集權領袖是最能適應時代和大眾要求的，同時這種制度還是直接與各個個人有關的代議制度。

領袖對統制人才的關係已如上述，統制人才對領袖應當怎樣呢？——那最要緊的便是有被強迫性和實際行動性。被強迫性的意義第一便是絕對服從領袖，第二便是個人絕對工具化。孫中山先生說過：

1, 「凡入黨者須服從我一人」

2, 「大家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各個人的自由都貢獻到革命黨來。」

但是統制人才對於領袖的真正貢獻，還是實際行動性，因為有了實際行動，所謂服從領袖和個人工具化的表現都在裏面了。實際行動是工作和能力的表現，是拿工作和能力來擁護領袖。這種工作和能力表現是技能的道德表現，是造成統制人才的最要條件。普通嘗謂軍隊的組織精神在服從與紀律；其實徒有空口的服從和具文的紀律，軍隊的組織是不能生存的。軍隊組織的生存由於他們的服從和紀律建築在

吃苦耐勞，拼命效死，有恒心，有戰鬥力等等美德上面；以此例言領袖與統制人才組合的生存正復相同，那便是說要有——技能的道德表現——工作和實力的表現了。

我人嘗謂在官僚政治的場合，政治的昌明由於賢人；在政黨政治的場合，政治的昌明由於領袖統制人才。上軌道的政治一定是合於時代需要的政黨領袖以統制人才在經營着。而統制人才的成功與失敗便成了一個政黨的幸運和厄運的最大關鍵，雖然這個政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已被公認為合宜。這是一個實際問題，這是現時國民黨遭遇的一個嚴重問題。

一個政黨的生存條件；第一要有先天的適合時代國情需要的主義——由這主義而孕生適合時代國情的政綱政策。第二要有後天的適合時代國情需要的行動——因為要有行動便先要有領袖和人才的組織和訓練。在三民主義被人們認為適合於時代國情的需要以後，國民黨的當前問題是行動不滿人意，那便是領袖和人才的組織和訓練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補救，許多人曾發表過許多不同的意見。最初一般人喊着鐵的紀律，鋼的組織，但是忽略了人的問題。所以無論紀律和組織在文字上是怎

樣地具有鋼鐵的剛性，終無補於黨的衰落。到了最近，黨中少壯份子感覺黨和革命的復興必須有一個黨魁居中策動，於是發動領袖運動，這便是一般人目為中國的法西斯運動。一個政黨需要一個黨魁和一個時代需要一個領袖同屬天經地義；然設若黃袍加身地擁出一個頭目，或如僭號稱尊的自封國號則正中丁莫索里尼一句格言：『法西斯不是出口貨』。所以在目前發動的領袖運動進程中，先要有人才的組織和訓練，然後才有力的正規行動，那便是先要研求領袖和統制人才的聯繫。

二二，十一，十五，於南京

領袖獨裁論

兼質胡適之張季鸞先生

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一年來在東方雜誌，大公報星期論壇、獨立評論，政治評論和人民評論上已充分發揮，這是知識羣衆關心國事的好現象。這個問題的解答只有待現實的開展，所以討論這個問題不可離開現實，否則不免爲哲人談玄，詩人夢想了。在這個問題正討論中，忽有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先生答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談話：「中國與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之必要。」同日蔣汪聯名通電也說：「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會無產主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這兩句話由現實的最高政治負責者說出，給反對獨裁者拾得，真成了大把握。胡適之先生便握住機會，一馬當先，在獨立評論上寫了一篇「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接着又在今年東方雜誌第一號裏總結「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諷刺主張獨裁的人民評論在那裏主張領袖獨裁，而他們認爲足以獨裁的領袖却

否認獨裁之必要。接着陶孟和先生根據南美各國獨裁政治的演化，其實舉出西班牙來更有力，和英國毛斯雷（法西斯領袖）的勞而無功，有今年國聞週報第一期裏發表了『民治與獨裁』，強硬的反對中國獨裁，但這是一篇學理。接着在國聞週報第五期裏，張季鸞先生的『關於獨裁制』，反對的理論則甚切中國現實；他反對國民黨改革黨制。這事最近反對中國獨裁的文章，然就此已够瞧了。適之先生本來是一位文章聖手，自發表『何時才有約法』以來，八年一貫足稱老牌『民治』，而天津大公報之爲輿論權威，誰也知道季鸞先生的筆的努力最多。他們的見解有獨到之處，在後面再說。但今年的長治與獨裁論戰有了這二位先生站在反獨裁的最前線，假若能擊破他們的論點，支撐獨裁的陣勢，那才真有趣呢？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討論這個問題不可離開現實』。然則現實如何？適之先生曾尖刻的指出現實的最高政治負責者否認獨裁之必要。這一煙幕彈的喜劇誑樂了學生，直等到季鸞先生來揭開。這位精明的新聞界權威一語破的告訴我們，『現行制就是一黨獨裁制。』這便是北伐以來，一般人號稱的『黨治』。七八年的事實擺在眼

前，適之先生偏要幽默的說：「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但他這種反對獨裁的論調還可拿出兩種遁詞來搪塞：第一，他看的是將來，所以他指出「討論的中心是中國將來的政治制度應該是獨裁呢？還是民主立憲呢？」第二，他反對的也許是「領袖獨裁」，而於「一黨獨裁」則未置議。討論到這裏，實事求是，關於前者應注意怎樣由現實過渡到將來？關於後者應注意政黨政治和領袖的關係。可惜他對於這兩點都沒有正確的理解，而只是異想天開的製造定義說「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現代式的獨裁可以說是研究院的政治」，又瞎子算命式的推論說：「兢兢業業的學民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只鴨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這個比喻很文學的，但在哲學家頭腦裏狗不如鴨子，却找不出什麼緣故。（許是常吃烤鴨麼？）

很明白的中國將來的政治制度，在適之先生看來，是民主立憲，而且需要一個「國會」做工具。他曾認真的說：「我至今還相信這種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國家統一的最有效方法。」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將來是全民以治，在憲政

時期要有一個國民大會；這可以包括民主立憲和國會的主張，而小有差別。但怎樣由現實過渡到將來呢？國民黨的手段是以唯一獨裁的力量，培植地方自治，加緊人民四權訓練，努力七項運動，而主張民主立憲和國會的適之先生却沒有方法論。借著代籌，從近代民主鬥爭和國會的經驗來講，堅決倡導民治的人縱不能揭竿而起，來一套法國革命；也該擬定政治綱領，組織政黨以便參預國會。這樣有了多數黨的國會，才有責任內閣，才有十九世紀末金字招牌的民主政治。現在環顧國中如何？流寇式的共產黨既一再崩潰，從國家主義派脫黨出來的國社黨且公開宣言解散。問題來了。沒有對抗的政黨，如何打倒一黨獨裁呢？沒有政黨的策動，如何推進民主政治呢？我們應知道現代政治或政治現代化和政黨政治是有密切關係的，一部民主政治史可以說是一部政黨政治史。假若尊重適之先生發明的定義：『民主政治是幼稚園政治，』那末政黨便是保姆了。沒有保姆，幼稚園是一個什麼情形？有人以為，國民黨全民政治的實現要等地方自治，四權訓練，七項運動成功以後，為期太遠；那麼，為民主政治而努力的政黨至今難形未具，恐怕民主政治的實現更屬河清難

俟了。有言論而無事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三十年來只有立憲民治的呼聲和言論，而沒有這種意向的健全政黨組織，是中國民主政治不能實現的一個原因。而政黨形成力量亦非一蹴可及，那是需要歷史的素養的。國民黨之有今日一黨獨裁絕非偶然，自興中會至十七年統一全國經過三十五年，自十三年改組至十七年統一全國經過五年，到現在一則四十二年，一則十二年。以此例彼，立憲民主的政黨現即成立，沒要等若干年才發生力量；而這個力量要勝過一個有歷史的國民黨以後才能爲所欲爲，更要等若干年，所以從現實論斷，就國中政黨現狀來說，中國將來的政治制度不容易像適之先生那樣想像的民主立憲，而論不定是他反對的獨裁呢。

至於「領袖獨裁」和「一黨獨裁」在現代式的獨裁政治的包含下，應該是一件事兩樣說法。在前面，我說過現代政治或政治現代化和政黨政治是有密切關係的，沒有政黨做基礎，不容易有民治，更不會有現代式的獨裁。政黨是獨裁的中心，領袖或稱黨魁又是政黨獨裁的中心。像意德土三國是領袖獨裁包括政黨獨裁（所以論到莫索里利，希特拉，凱末爾的豐功偉業不能離開他們的黨）。像蘇俄是政獨裁

而雖然有實際領袖獨裁，所以談到蘇俄共產黨的成功，不該丟了列寧，別達林。）像美國，是民主黨在共黨時期黨魁倚其黨的勢力發爲類似獨裁的緊急處置，假若沒有民主黨多數黨的國會，羅斯福便做不通。總之，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領袖獨裁和政黨獨裁是輔車相倚，二者合一的。領袖不能離開政黨而獨裁，有之，便是專制的獨夫或帝王，政黨獨裁不能沒有領袖，假若沒有，便要失敗。我們從來的主張：「由黨產生黨魁以宣布獨裁。」

這句話雖然簡單，但是從苦痛的經驗裏得來的。這是一個原則，實際做起來，也不像這十一個字那樣簡單，這個主張的提出，除掉適之先生在東方雜誌上所引人民評論第五十七號裏兩段以外，在同刊第二十八號（上年元旦出版）已有這樣一段：

「故今者與其築室道謀，辦理治理，不如擁護領袖登高一呼，率衆力行。故當此以黨治國與開放政權爭論不定之際，我人獨主張重建有力的黨，由領袖統制人才以圖政治建設。若今日之以黨治國決無久可敷衍之道，而開放政權亦屬一時羈縻士大夫階級之政策而已。」

在同刊第五十五號更有這樣一段：

「黨治如何改造？則宜從青之改造始，黨宜有黨魁，以爲全黨號令而統率之。

然後政治方略有所取決，黨員知所服從，樂於秉命馳驅。如是，黨乃有組織，有重心，有動力，有紀律。此乃一般政黨共具之條件，而國民黨獨付缺如。故急須改造，產生黨魁，兼以救黨焉。黨魁既立，更以黨爲中心發動黨治，然後黨治乃權力集中而具效率。此又世界各黨治國家如蘇俄，意，德，土等國所共有之事實，而爲中國號稱以黨治國者之所未有。故急須改造，在唯一黨魁指揮下，推行黨治，亦所以救國也。十年以來，世界黨治國家之成功者蘇俄以外，更有意，土，德諸國惟我國獨告失敗。則以諸國之黨治各有其黨魁列寧，斯達林，莫索里尼，凱末爾，希特勒輩居間策動，易收功效而我國國民黨自十四年總理孫中山先生去世，後繼無人，黨魁不立，動力分散，致十年黨治，徒勞無功，變亂不已。故我人對當前救黨救國之意見，突破唐穎黨治與開放政權之歧途，主張黨政一體，由黨產生黨魁以宣布獨裁。黨政實施非其時，對現時不徹底之黨治亦不必作骸骨之迷戀。至此原則黨務可錄

以改造，國事可循之革新。未來黨的中央總裁即爲國的大總統，政治的最高首領。推之地方，省長縣長必屬黨的省縣特派員，黨政一體，然後黨的政綱政策乃見實施，而可獲真正政黨之效果。」

這個黨治改造運動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關於「黨」的，可以說是領袖運動，要有一個黨魁，取消委員制，改變組織，改造黨員。一方面是關於「治」的，可以說是政治獨裁運動，要實現真正黨治，反對開放政權，改變政府組織，領袖獨裁。他的程序是先改造黨，然後改造政治，那就是先有黨魁而後才談到政治上的獨裁，也就是上文所說的，由黨產生黨魁以宣布獨裁了。

問題討論到這裏，可以隨手把張季鸞先生拉入漩渦。他似乎不反對黨治，也沒有主張民治，但他反對國民黨改制，他說：

「這兩年國民黨青年中，起了擁護惟一領袖的呼聲，其動機由於不滿政治現狀，希望有效率更高的政治，作緊急救國的事業。這些人熱血沸騰着，爲一種真誠所鼓動而作此主張，這些情形，我們可以諒解。不過事實上，國家對外這樣

無力，而內部尙且有若干障礙之時，這種改革黨制的主張，與實際未必適宜。勉強推行。更增加國家的危險，恐怕得不到任何利益。』他好像承認現實，已然是一黨獨裁無可如何；但是黨裏不可再產生領袖獨裁，據他看來有三個理由：1. 領袖的權責本來很重。2. 需要人人自覺自動的負責做事，3. 危邦不適於獨裁。他的辦法是就現行制下設法增進政治效率，網羅知識權威，一切集中於中常會。誠然，領袖權責本來不輕，固然還有其他領袖，但一切大計本來取決於負責最重之一領袖，所以國事至此，不能歸咎於權力之不集中。』誠然，確有負責最重之一領袖，但權力并不集中於他。從寧漢分裂，特別委員會，「粵委」，二屆中央，擴大會議，非常會議，西南執行部一串事實可以證明。奈何領袖不擁護領袖負責最重之一領袖終不免代人受過而已。其結果雖欲獨負重責亦有不能，自寧漢分裂以至現在不斷奔走之團結，有一次不提出要求負責最重之一領袖下野的條件麼？國事至此，想怕還是要歸咎於權力不集中罷！其次，季鸞先生恐怕領袖獨裁減低一般公務員及知識分子的責任觀念，不能使人人自覺自動的負責做事。但這不免有因噎廢食的過

慮。他舉例說，「譬如新生活運動，領袖所在或所過之地就表現緊張，領袖不在而前便差得多。」這是事實，但這不能怪領袖不該倡導，乃因始初倡導，風氣沒有養成才有此現象。這樣正需要一個領袖以身作則，風範全國。最後，季鸞先生以為危弱之邦不能行義德式的制度，這是熟讀春秋，恐怕敵國割盟。充其意似乎現在的凱末爾和當年的華盛頓都應該躲在「棹底下幹，而莫索里尼和希特拉已不免替義德二國冒了大險。這個意見，我們不願深駁；但是馬關條約也得有一個李鴻章來擔當。季鸞先生應付這個問題的政策是利有建樹許多小的中心，使平時如衆星拱月，一旦大禍臨頭可以免根本破壞。他這句話，我們完全贊同，并且正是主張領袖獨裁的根據。衆星拱月的「月」便是唯一領袖，衆星式的「小的中心」便是我們常說的黨的幹部了。這個幹部散在各地便是中央的地方工具，而決不是割據的封建勢力，但也許他說的衆星拱月是「鞏固政治重心」，那便是「一切集中於中常會。」但是，中常會有九個常委，他們裏面有寧漢分裂，特別委員會，粵委，二屆中央，擴大會議，非常會議，西南執行部的主角，請問政治重心怎樣可以鞏固？政理如同物理，重心只

有一個，根據季鸞「先生衆星拱月」「鞏固政治重心」的原則，便須主張領袖獨裁。

○

○

○

○

這裏所謂領袖獨裁有領袖運動和政治獨裁運動雙軌，前面已經說過。領袖運動的成功誠不免成政治獨裁運動，但前者是國民黨完成政黨組織運動 反對獨裁的適之季鸞二先生也要干涉國民黨家事，不許他組織健全麼？國民黨的歷史是領袖獨裁的，我們可搬一點掌故來證明：

1. 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的時候 曾說：「凡入黨者須服從我一人。」

2. 國民黨總章第四章會規定：「黨員須服從總理之指導以努力於主義之進行，總理爲全國代表大會之主席，總理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主席，總理對於全國代表大會之議決有交覆議之權，總理對於中央執行委員之議決有最後決定之權。」總理高於一切，所以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總章，全國代表大會只是最高機關，而不是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之爲最高權力機關，是後來修正的。一個政黨的**最高權力應該屬於一個黨魁**那才是正規；這樣黨有了中心力量，整個黨才有動力，

才能活動。才有道德的維繫，才能執行紀律。

3、同盟會四綱，其處分之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第二期為約法之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等於建國大綱所定之軍政，訓政，憲政時期，這是最一貫的一黨獨裁主張。

4、中華革命黨總章第五條載『自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名曰革命時期。在此時期之內，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力為其難，為同胞創造無窮之幸福。』這個革命時期，便是獨裁。

從上面四條的證明，我們看出國民黨的黨治早具規模，以往未必是抄自蘇俄，現在也非仿效義德。季鸞先生提醒大家說：『我們之不能學義德俄，猶之不能學英美，我們要創造自己的。』是的，現在國民黨的領袖運動便是『自己的』，這不是衝動，而是由於苦痛的經驗。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陳立夫先生二十二年四月間視察北方黨務的長篇報告，曾沉痛指出黨務的失敗，提要，的說：『一切制度的靈魂組織的精神是道德，委員制徒成了不道德的訓練所。重心不立一切組織和努力都是空

的，重心的最後單位是一。有了重心還須有動力，動力向外發展增加內部組織的管
力。若無紀律，重心必墮，動力必亂，有兩個重心不會有紀律；使紀律弄壞，莫過
於選舉。』且推陳出新乃生物學上之必然原則 國民黨欲不失却有機體作用。則當
本生長（Growing）之義 先求政黨的健全以赴當前政治危局。按國民黨自十三年
改組迄今已十一載，自十七年總登記迄今亦已七年。依政黨成例，在此七年至十一
年中，黨的本身早應有整理陣容，淘汰腐惡，補充生力之必要，而黨魁不立尤違政
黨原理。

其

其

其

其

所以無論適之先生怎樣咬定『中國無獨裁之必要與可能』，季鸞先生怎樣反對
獨裁制，國民黨不能不完成政黨組織條件。國民黨要完成組織條件，無疑的要努力
領袖運動，因此而聯帶促進獨裁政治運動是可能的，所以反對中國獨裁政治運動，
不可連國民黨領袖運動也反對在內。但是真有人反對也無庸恐懼。自從二十一年由
文字的鼓吹到現在，領袖運動，已有若干事實的表現，最顯著的是I. 國民黨中央曾

授中央委員兼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先生全權指揮剿匪各省黨部。2、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黨部取消委員制改設特派員，上年十一月間蔣委員長視察各地，對黨務曾批評說：「各省黨部特派員制實行後，事權集中，黨務整理日有起色，此制可謂已著成效。」3、上年一月間，華北各省市黨部代表挾策入京，曾建議：「省市黨部以下各級黨部選舉應即停止，改進省市黨部之組織，實行責任制度。省市黨部設主任委員兼採評議制度，縣黨部以下各級黨部設特派員一員以專責成。」這個建議已有實現的。4、上年一月十三日北平晨報專電載「自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總理名義為紀念起見乃保留，但位置迄今虛懸。近聞中央各委以際此多難之時，黨基益有鞏固必要。總理為一黨領袖，似宜設置，以一事權。擬於四屆全會時，研究總理制恢復問題；如決恢復，則連帶討論人選。」但恢復總理制事關修改黨章，須待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才有權力討論；將來開會時，這個問題必最為各方注意。5、現時國民黨黨員入黨時已能注意實行總理之言：「凡入黨者須服從我一人。」

在獨裁政治運動方面，消極的也有若干事實的表現。最顯著的是1、國民黨原定

於二十二年七月一日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討論提前召集國民大會問題，準標開放政權。乃始則改於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繼復改期於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最近又改於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開放政權問題，遂無形擱置。2. 各省市人民參政機關籌備停頓，北平市參議會撤銷，且無一反對。而由全國職業羣選出來的國民會議和由全國知識羣挑出來的國難會議沒有絲毫表現倡導民治者的努力和能力，實予國人以壞印象。3. 各省政府主席權責加重，各縣裁局改科。4. 在野高唱『民主』的汪精衛氏上了政治舞台於大權在握之際，實際體驗之後，竟放棄原有主張，置之腦後。5. 反對黨治最力的輿論界權威天津大公報於二十年六月二日社評說：「夫吾人固非迷信憲政，陶醉理想者流，以爲憲法朝頒，國家夕治，訓政取消，民權立振。」天津益世報同年六月八日社論也說：「其實，國事到了這個地步，即令取消黨治，未必真能挽救。」而最近外交評論徐道鄰氏著文竟謂：中國的知識階級現在已公認唯有鞭策國民黨努力自愛，中國始可以對外；而自九一八以來，在事實上中國已造成了一個可以提挈全國國民的黨及其事實上的領袖

。」又說：「無論由何種方面說，中國國民黨在此十年以內是沒有一種力量所能推翻的。」（徐氏不是黨員，說了這番話，令我們黨員聽了只有戰兢奮勵。）

所以就現實論，領袖獨裁運動似乎頗有進展，而民主政治則毫無實現可能的痕跡，這個理由何在也應該說一下。民主政治現時不可能，因為1，尚無其他政黨來策動，2，國民經濟落後，沒有領導的資本階級，3，國民文化落後，沒有選舉知識，4，總理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個自由平等，是國家的集團的，而不是人民各個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和法國革命，俄國革命都有差別。我們要求得國家的自由平等和生存，然後才談到人民的自由平等和生存。所以以人權自由為出發點的民主政治或共產主義在中國現時尚談不到。

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理由，自然就是領袖獨裁可能的一部份理由，但還該說明「爲什麼要獨裁」。我們很感謝陶孟和先生這樣提醒大家。現在這樣開在下面

1. 過去憲政失敗的教訓和現實民主政治之不可能。
2. 澈底實施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不是三年五年可成的。

3. 國民黨根據歷史的精神和現實的苦痛經驗，要完成政黨的組織條件。

4. 「國民黨十三年改組，有總理做黨魁，力量集中。所以有後來革命的勝利，而聯俄容共無不成功。」

「談到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國民黨十三年改組還有一個主要精神，一個推動革命的基本因素，這個主要精神和基本因素便是革命力量的向心集中。力量向心集中的結果自然趨於集權，集權的結果更促進力量集中，二者互為因果，相得益彰，於是造成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居中策動，政策一貫，而有初期革命的勝利。這個集權的最高革命權力的具體化便是總理以黨魁兼大元帥；實現他手訂建國大綱裏的軍政時期制度，集黨政軍三大權力於一人。」見「改組十年」。

5. 「現在中國既在開國時代，且外須復仇雪恥，內須剿共濟匪；如此時代，沙灘上的民主政治可以有什麼？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馬上得天下」，所以過去開國時代的成功人物都為武人，美國開國必須薩盛頓，土耳其復國必須凱

末耳，德國戰後殘局的維繫必須興登堡。這些歷史的和時代教訓都指向中國。現時代需要一個革命的軍事領袖，循着一個嚴正軌道的政治方案，領導着全國人民硬幹。正如列車，要一個車頭循着路軌，着載乘客，駛向目的地。」見「沙灘上的民主政治」

6. 「我們時代的生活已被貪污土劣糟踏不堪，而我們的政治理想不僅是廉潔的，並且還要全民的。我們在這種衝突的環境中，要走向理想的廉潔政治，全民政治，需要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領導着一般同氣的政治者，以他們的人格去改造頹廢的生活，指導並管理成員的生活。所以這個時代需要一個唯一領袖。這個領袖對於時代的生活和政治負有轉變的任務。他要使目前頹廢的生活振作起來，把貪污的生活剷除乾盡。由腐濁生活到廉潔社會，由廉潔政治到全民政治，他的任務才算完成。」見「生活與政治」。

7. 「幾年以來鬧着精誠團結，隨團隨分，隨結隨散：便是沒有依政治主張做精誠團結的根據。所以政治活動必須以政治主張為樞紐，行動要集中而一貫：

這便需要黨的一個領袖做指揮。他是黨的政治主張最高保障者，這樣黨員的政治活動，能協調一致，而致黨的行動才是整個的和負責任的。目前要復興國民黨，便先要黨員的政治活動和政治主張聯合。這便要統制黨員的政治行動。

『由喚起黨員的政治意識，到提倡黨員的政治活動，統制黨員的政治行動；這樣才有計劃的培植黨員的政治生活，才可以把握政權，談得上『以黨治國』。』見『黨員與政治生活』

8. 在官僚以治的場合，政治的昌明由於賢人，在政黨政治的場合，政治的昌明由於統制人才，上軌道的政治一定是合於是代需要的政黨以統制人才在經營着。而統制人才的成功與失敗便成了一個政黨的幸運和厄運的最後關鍵，雖然這個政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已被公認為合宜。

『黨治和革命的失敗顯然因為忽略了統制人才，所以國家民族建設不起來，黨的主義，政綱，政策不能實現，官僚政治依然橫行，因為零碎的幹不能擊

破整個的舊勢力；散漫的幹不能打敗已成形的舊勢力；豈止不能，並且還要被舊勢力同化，在這樣局面之下，談不到政治改造。我人可以大胆說一句：中國政治要有改造須在統制人才以後，目前空言政治改造只是緣木求魚；始終跳不出官僚政治的窠臼。然則統制人才將如何去計劃並如何去策動？這便需要一個集權的統治力量來支配；依現在政治事業應由政黨來擔當責任和義務來說，那便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黨魁主持」見「統治人才與政治。」

9. 最後，勵行生產建設也需要領袖獨裁。錢端升先生說過：「我以為中國所需要者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中國急需於最短時期成一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欲使全國工業化決非一二年內能夠做到，但在一二十年內沿海各省務使有高度的工業化，而內地各省的農業。則能與沿海的工業相依輔。……欲達到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集權國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國家有這種權力，則又非賴深得民心的獨裁制度不為功」錢先生這個議論極有遠見。這裏有一個證明：最近東南五省公路的建設，假若沒有蔣委

員長的嚴厲督促，恐怕功不及此過。又有一個證明，全國經濟委員會和內政部都會計劃過調查全國土地，且因為人才和經濟困難迄無進行辦法。後來請了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陳立夫先生擔任土地委員會主任，他便計劃策動各省黨部人員和黨員來做這件事，計劃的時候，據說外國顧問和各方都不相信陳先生和他指揮的黨員有些能耐，甚至在旁訕笑。但是他毅然先把這些人加以短期的訓練，用深得「黨」心的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的力量加以策動，竟以六個月的期間，八萬元的代價把十七八省的土地調查問題解決了。

上面舉的幾個需要獨裁的理由，有許多早已提過；我想一定還有許多沒有想到的。季鸞先生曾向主張獨裁的這警告：「現在只說獨裁好，不說獨裁以後做些甚麼事，」這不是無的放矢麼？大概他指的是獨裁者「對於國家需要，有一套適時的綱領。」上面所舉的幾項，不知他以為當意否？我想等到領袖出現，具體綱領總會有一個，不過總理遺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其全部遺教的「適時」程度現在也不會差得太遠。適之先生曾驕傲地對人說，他有三個反對獨裁的理由，「至今

不會得着一個滿意的答辯。』第一，他「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假若他說專制是現代式的獨裁，那麼季鸞先生已告訴他，「現行制就是一黨獨裁制」，我們在前面也說了很多。第二，他「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情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局面。」這個問題，我們以為在上面所舉的九個理由裏，可以解答了。第三，他以為「……現代的獨裁政治是一種特別英傑的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數的專家政治……」這個問題却轉到獨裁政治本身的條件上面去了。

〇

〇

〇

〇

獨裁政治並不比民主政治特別英傑，二者同樣的需要專家，所以我們只能斷章取義承認適之先生說獨裁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數的專家政治這句話是對的。同樣季鸞先生也主張「網羅知識權威」。適之先生又主張要有能專政的黨員，像蘇俄有二百萬人，意大利有四百萬人。這見解也很有道理。此外丁文江先生曾提出領袖有四個條件：1. 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2. 要澈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3. 要能

能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4.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吳景超先生對於此也擬有四個條件：『1.他要有爲國爲民的聲望、這種聲望是建築在領袖的行爲上面的。2.他要有知人善用之明，網羅國內第一流人物來與他合作，3.他要有開誠布公的胸懷，真是推赤心置人腹中，4.還應當有現代的眼光及一個高明的外交政策。』他們的意見都非常之好，有許多地方是大同小異，並且和我們相同。現在具體的補充一點：

1.領袖的本身應該這樣：

『社會依生存關係之變動而變動，歷史就是人類在生存關係中之實踐的結果。但社會之歷史的演進，必有其契機及其方式。可是這些問題，絕不是一般人所能認識或預見，只有具備特別聰明才智的人，他才有超人的眼光，魄力，他才有懇摯的同情與夫熱烈的要求。他站在時代的前端，指示大眾以奮鬥的途徑，他自身且積極出現於陣線之前，爲人類生存關係之確保及改進而努力，於是他被大眾認識了，推戴他做社會的領袖——時代的中心。可知社會必須有改進，而改進又必須有領袖爲』

之前導。這樣，領袖便是社會的時代的產兒，他離不開社會，社會也少不了他。他是最能適應時代要求的一個人，既不是少數人所能擁戴，也不是少數人所能推翻。」

「時代的領袖是怎樣他一個人呢？時代領袖應該是一個政黨的黨魁，那便是說由政黨魁的黨魁到時代的領袖，這樣地一個時代的領袖在上面有主義和政綱政策的範圍，在下面有黨的統治人才的幫助和民衆的擁戴。他是一個有組織的，集權的德謨克拉西的代表；他有統制人才做他的事業基礎。」領袖與統制人才」

2. 幹部，專家，統制人才的培養：

「中國今日既需要革命，既需要本黨去負擔革命的使命，則怎樣去充實本黨，使能形成一個革命之集團，凡屬黨員自應殫精竭慮，去找尋補救的辦法。個人意見。以爲本黨能否完成革命使命，至少必須具備下列三個條件：第一，要使全國人才，集中於本黨，本黨黨員爲全國最優秀的份子；第二，要使黨內份子都能竭其智能，爲黨服務，而不復顧及其私；第三，要使黨與全國大多數的勞苦民衆在利害上成爲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是本黨成敗的關鍵，所以建樹幹部，便要從這三處着眼。」

見「五全代會之意義與使命」

「時代需要適用的制度，更需要傑出的人才來革新或創造制度，尤其需要有組織和訓練的人才來推行制度。本來政治事業發展到現代，人才和制度的關係已密切到不易分離。制度的內容包括人才的統制，而人才的統制也就含有『制度的』意味並受制度的範圍。所以統制人才是制度的重心，有統制人才集團為時代而勞動，鬥爭，創造，決不因一二人亡而廢棄了集團對於時代未完成的使命和應有的，力，若謂此為人治，實已具有強度的法治化。這種強度法制化的人治重在領袖與統制人才的聯繫……」

「領袖和統制人才的結合應該以上述的統一觀念和生活為基礎，領袖選擇人才依上述的統制觀念和生活為標準才是統制人才，領袖的基礎建築在這種統制人才上面才可以成功，而不致失敗。領袖的責任在有這種選擇的認識，並以行動的毅力為以身作則的訓練，由計劃的配備進行組織，完成技術統治（Technology）使人才各得其用，用得其宜，才不至濫殺、衝突。」「見領袖與統制人才」

3. 領袖，幹部，民衆與事業的表現：

「領袖與統制人才的聯繫是現代政治上領袖取得民衆信仰的一種重要技術。領袖對於民族和以黨的忠實在能奉行主義，政綱，政策。領袖對於民衆的信仰在能實現主義，政綱，政策。而如何始能奉行和實現主義，政綱，政策，則在領袖用人的腕力，所以需要統制人才。」

「領袖指揮着統制人才勞作才能獲得民衆對於行的或動的信仰。統制人才以行動溝通主義，政綱，政策和民衆二者的結合，造成領袖的事業基礎，由事業的成績和信譽獲得民衆的信仰，才是真正的民衆基礎。」

「各種社會層的事業需要各種社會層的人才。由各種社會層統制人才的領導，建築各種社會層的民衆運動，結實成民衆，基礎，乃完成領袖的整個民族基礎。」見「領袖與統制人才」

「固然，歷史是人類創造的，不是領袖獨創的；尤其在社會關係日益複雜的現代，運動的推進，少不了組織的力量，由大眾的基礎到先知先覺者幹部的結合。然

大衆以幹部爲核心，幹部又以領袖爲核心，幹部是大衆意志之集中的表現；領袖又是幹部意志之集中的表現。」見『領袖與統制人才』

4. 黨員的改造：

第一，黨員要有服從黨魁的認識，總理說過：『凡入黨者須服從我一人。第二，黨員要絕對做黨的工具，總理說過：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個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黨來；凡是黨內的紀律大家都遵守；黨內的命令大家都要服從。全黨運動，一致進行。只全黨有自由，個人不能自由。然後我們的革命，方可以成功。第三，黨員要有服役犧牲的精神，爲國家社會謀福利，爲國家作一點最低限度工作，而不許自私自利，總理說過：人生應以服務爲目的，而不以奪取爲目的。五卅代會之意義與使命。』第四，『1. 黨員是爲政治而存在的，離開了政治，便失却其爲黨員。政黨是在政治之內活動的，拋棄了政治，便不是政黨。2. 黨員應努力把握現實政治，忘記了努力或不努力，不能稱爲黨員。政黨應努力把握任政權，把握任以後，若予以拋棄或出讓，是自壞其政黨任命

3.黨員政治活動要相應於其政治主張，不能出於政黨的立場，不能違背政黨領袖的指揮；所以政黨的進退是負責而一致的。」見『黨員與政治生活』

上面種種意見有的已寫成專篇，現在摘要列出，以證明『爲甚麼要獨裁』和『獨裁以後做些甚麼』也曾有人拉雜說過，兼以就正於適之季鸞先生。

最後，適之，季鸞，孟和諸先生好像都以爲中國民族性不宜於獨裁和服從領袖。這需要事實證明：據獨立評論壽生先生向適之先生報告：

『去年暑假回南，在鄉裏聽得村夫野老嘆恨：『這個命真革得糟，從前皇帝在的時候，那裏是這個樣子，就是在長毛反的時候，也沒有現在這樣混亂呀！不曉得要那一天，真命人主才登位啊？』』

這不能說不是近於要求領袖的呼聲。Cooley說過：

『要領袖的是羣衆，他們要領袖做指導，才有領袖的出現。他們不要領袖，不要引導，是沒有用的。所以羣衆要領袖，領袖尤其要羣衆。領袖必須爲羣衆的一份子，一個最優秀的份子才能得他們的同情，他們的信仰，他一定要同情羣衆的要求，代』

表羣衆的意見；講的話是他們所要講的，作的事是他們所要作的，才是真正的領袖。」

領袖獨裁是現實的要求，且已形成趨勢，一切當漸次在現實前展開。

二四，二，十於觀音堂。

沙灘上的民主政治

時代創化中的我們在這個過渡時代中，應該先看清環境，認識時代，然後才不致走錯路。西儒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說過，「人類是政治的動物」，站在政治的立場，每一個人，皆應有此認識，尤其是一個實際參加政治工作的份子，——一個革命政黨的黨員。明代大政治家張江陵有言：「天生一世之才，必足爲一世之用」。例言之，十七世紀的人才，必足爲十七世紀之用；若以做二十世紀的工作，則必然的失敗。易言之，若在二十世來做十七世紀的工作，那也必然會失敗。時代的認識是如此重要。故由時代的認識到時代的行動，才有成功之把握。而現時代之成功，（或稱爲現時代之進步較爲妥實，）則爲每一政治家，政治工作者，與政治的人類之共同企求；故宜先有時代的認識。

在時代的認識中有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一種時代思潮和時代運動應具有地方性，更具有相當過程。在經濟學說上，亞丹斯密的「原富」支配了前一個時期，馬

克思的「資本論」支配了後一個時期。在現時好像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時代了；然由「原富」的個人主義經濟學說衍生的英國保守黨還廢續着牠的歷史的使命，而由「資本論」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說衍生的蘇俄波爾雪維克已不免賣了牠的祖宗，改採修正的新經濟政策。又社會主義運動在英國是基爾特，在法國是工團主義，在中國是民生主義。時代和地方是這樣限制着政治趨勢。我們先要有認識，然後才不致跑在時代前頭或落在時代背後，自己走錯了路還不知道，却徒然在抱怨自己，或羨慕他人。或者只看見結果，而沒有看見過程，便要與人媲美。現代歐美民主政治惹得一般人們口饒欲滴，或大聲高呼，或長吁短嘆，中國何以未能實現歐美民主政治。這便是忽略了民主政治的地方性和相當過程，這便是沒有時代的認識。

沒有時代認識的人們以為歐美實行民主政治，我們也應該實行民主政治。它們不知道，歐美之有今日，是與昨日不同的。它有它歷史的發展，到今天，才有民主政治的成功，——究其實，也還在動搖呢！——當英國在產業革命的時候，美國獨立的時侯，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說得上民主政治嗎？現在的中國，却正是那時的英

，法 美，而與現在英法美的國情不同。目前包括這些見解的士大夫階級，以汪精衛氏爲班首，以爲中國也該把現在歐美所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搬來學一學，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在這裏我們得先談一談什麼是政治和對於政治有關係的政體的變革是怎樣。簡括的說，自古以來的政治只是統治者理被統治者的治術。從前封建時代的政治只是少數君主教皇貴族治理非君主教皇貴族等人民的治術近代產業革命以後的政治，只是少數資產階級統治非資產階級。

即以歐美民主政治而論，大家都知道他是產業革命和都市興起的產物；而這種產業革命和都市興起決非一蹴可及。過去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曾經過長期的鬥爭過程，在英國是四十五年，在法國是四十年，在日本也將近三十年。中國革命今才幾年便要行民主政治？請問，把中國的民主政治建築在什麼基礎上面。即使照歐美的民主政治照樣搬演一下，請問我們的產業現在有什麼成就；我們也有歐美產業革命後形成的資產階級麼？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中國民族資本何時可以抬頭，

而形成一個强有力的資產階級？我們的市民有什麼程度和力量？退一步說，假定以上的問題答案都是肯定的，（其實全是否定的）請問把中國的民主政治建築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上，也是我們革命的理想麼？民生主義的優點，在調和勞資衝突，消弭階級鬥爭。現在因為要實現民主政治，可以背叛革命，開倒車，重走上資本主義的錯誤道上麼？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不可能，並且不是我們革命的理想。

主張民主政治的人或者要說，中國的民主政治的基礎是要在建築在工農大眾上面。國民革命的目標是全民政治，工農佔全民百分白八十五以上。所謂工農民主政治和全民政治也相離不遠。我們且假定這話可行，請問工農民主政治在十年二十年以內有辦法麼，三十年以至五十年以內，文化落後，經濟破產的愚而且貧的農工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和豪紳買辦階級雙重壓迫下，有參加民主政治的能力麼？民主政治的初步是選舉，請問這些愚而且貧的農工也有選舉的知識，權力和自由麼？——我們大都來自鄉間，應不諱言答覆是否定的。建築在工農基礎上的民主政治三五十年內既不允許實現，那麼在這三五十年以內，實事求是去做政治工作的人應該怎樣

努力呢？事實上不可能的民主政治，無異是建築在沙灘上。縱然，一個博學通儒能把民主政治講得如何有根據，有價值。一個投機政客能把民主政治說得天花亂墜。但那是三五十年後的唐虞盛業。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一個政治的人類，一個實際參加政治工作的人員和一個政治家應時時刻刻，把握住機會，求國家的進步，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好。這樣一天一天的求進步，則三五十年後民主政治才有實現的可能。假若認識不清，亂作主張，必致一無所成。或者守株待兔，等着三五十年後，再兌民主政治的支票；其結果自以為跳在時代前頭，其實跼在時代圈裏絲毫沒有動。原來是陷在沙灘上的民主政治，不動。

不動是現代中國政治的最大病根。不動的原因，一種是沒有知識，一種是跑在時代前頭或落在時代背後，唱着不合時宜的高調。其實這種高調等於晉末亡國時的清談。一個政治家，一個實際參加政治的工作人員和一個政治人類應該替民族國家負責任，應該替時代負責任，向未來的社會努力，求切實的進步；不許高調，不得清談，要腳踏實地的做工夫，針針見血，步步有印。要從不動中，動起來，先要有

時代的認識。在消極方面我們已指出沙灘上的民主政治的錯誤，在積極方面是怎樣呢？

現時代雖然是二十世紀，而在歐美國家固可稱爲二十世紀的國家；若中國則如老來子，尙在襁褓之中。以言文化與經濟之現代化程度則彷彿歐洲十六七世紀之交。以言國運與民力，則比之十八世紀之法國革命，美國獨立且有未逮。以言建國困難之程度較之歐戰中之比利時與歐戰後之土耳其則內憂孔多，且無其外交上之與國，而日本之強既可與普法戰前之德比，更十倍於希臘，而其處境優又俱勝之。如此情境，不可抱怨自己，羨慕他人，應該看清歐美國家如何由十六七世紀進展到二十世紀的現代化程度，應該體念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時期的困苦艱難，比利時和土耳其復國時期的堅辛奮鬥。中國是正在開國的時候，我們看看美國獨立費了十三年的工夫，法國革命竟有八九十年的紛亂，假若我們拿當時的報紙來比較和現在的中國怎樣，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處在一個什麼時代和怎樣努力了。

以前，我們常常提出兩個口號，一個是「打倒軍閥」，一個是「打倒帝國主義」。

「，我們知道軍閥不過是一些武人帶着一些私兵，佔據着一些地盤的一種名稱。要打倒它是非常容易的。而帝國主義呢？它有深厚的歷史性，自產業革命以來，多則百餘年少亦有六七十年的歷史，而且具備物質的條件。我們如果要想把帝國主義打倒，那就不是打倒軍閥那麼容易了！要打倒先要能對抗。我們要對抗帝國主義，要先有物質的建設準備，才能够譚得上對外！記得有一個例子可以用來說明我人之理論。當歐戰的時候，法國人在飛機上開槍，使德國人受到了很大的威脅，有一個德國人名福格者在捕得一架法國的裝槍飛機以後，便發明了戰鬥機，利用了這戰鬥機把法國打敗了。後來法國和英國又捕得一架德國的戰鬥機從事仿造，遂成空軍對抗之局。這個例說明了，我們如果要對抗帝國主義沒有物質的準備是萬萬不行的。帝國主義維持到現在，它有它一百多年的歷史，它有它物質的條件，我們假若沒有這種認識和準備，便沒有在這時代的中國做政治工作的可能。

最近有些報紙上的紀載對次抗日的失敗說是因爲受了匪共的牽掣，這不無相當關係。現在共匪盤踞江西，江西是長江最重要的區域。當太平天國事起，曾國藩最

初的作戰計劃是採取包圍南京的戰略，殊不知到後來楊秀清竄至江西，幾使湘軍功虧一簣。還是後來肅清了江西，才克復南京。十五六年討論國府遷都的時候，有人主張不遷武漢，而遷往南昌，也就同此作用。假若現在放棄了共黨不去剿，那就與明末的情形相同了。現在中國的情形，外有日本，內有赤匪，幸主持大計之最高領袖，有極清晰之認識，方針早定，步驟不亂。我們試看看明末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不當，只顧邊患，却忽略了李自成，張獻忠，終於明室以夷。假如那時對李張諸賊加以注意，清室決不會成功。因為流寇的肆擾才有被清太祖利用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使我們更加確信抗日剿共是應該並重而不該應忽略其一。以上是我們應該把握着時代的需要，而加以認識的，所以我人不殫一再申述，引起大家注意。

現在中國既在開國時代且外須抗日反帝，內須剿共清匪；如此時代，沙灘上的民主政治可以有什麼？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馬上得天下」，所以過去開國時代的成功人物都為武人，即在外國亦莫不然，美國開國必須華盛頓，土耳其復國必須凱末爾，德國戰後殘局的維繫必須興登堡。這些歷史的和時代的教訓都指向中國現時

代需要一個革命的軍事領袖，循着一個嚴正軌道的政治方案，領導着全國人民硬幹。正如列車需要一個車頭循着路軌，載着乘客，駛向目的地。時代的需要是這樣，而不是沙灘上的民主政治。一個政治家，一個實際參加政治的工作人員和一個政治的人類應該有時代的認識，還要為時代負責任，下切實工夫，求時代的進步向未來社會腳踏實地去努力。我們應該按照孫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內，所指示於我們的步驟去做。我們要求進步，不是以維持現狀為目的。我們應該要求政治的成功，而不是為時代所悞。人民一定要經過四權訓練才能够實際實現全民政治。現在一般人動輒主張開放政權，並不從根本的訓練着手。徒唱口號是不切於實際的。所以我們批評這種沒有基礎的民主政治的是建築在沙灘上。

二十二年古閏五月初五日三十之晨紀念作。

「還政於民」

民國肇建，立約法，創國會，選議員，組內閣，赫然憲政之治，政屬於民。然而考其實，則十五年間，大盜盜國，小盜盜省，豪紳玩權於城，士劣弄民於鄉，共和徒有其名，民國未見其實，所以，中山先生懲前毖後，定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建國步驟，並且在他制定建國大綱宣言裏說：

「倘能依建國大綱以行，則軍政時代已能肅清反側，訓政時代已能扶植民治，雖無憲政之民，而人民所得權利與幸福，已非藉憲法而行專政者所可同日而語，且由此以至憲政時期，爲國民計，莫善於此。」

「蓋不經軍政時代，則反革命勢力無由掃蕩，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羣衆，以得其同情與信仰，不經訓政時代則大多之人民久經束縛，雖驟被解放，初不瞭知其活動之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即爲人利川，陷於反革命而不自知。」

這是國民黨主張以黨訓政的基礎理論和最近五年來中央政治設施的根據，黨軍北伐之初，揭此標目，由珠江流域而進於長江流域，到處人民歡迎，大有「奚我后，后來其蘇」之感，所謂憲政之治的議士制度既久已解體，至此竟不值一文，是爲軍政時期之黃金時代。不幸在革命的過程中，軍事的發展超過了黨，表面與三民主義共鳴的軍隊都投機到了黨裏來，同時五三之役厄於濟南。自此而後，對於舊有勢力類取妥協態度，無復當年革命氣概。所謂軍政時期工作既然不徹底，實際亦未完成，便一步跨到了訓政時期。但是欲蓋彌彰，軍軍時期沒有徹底的工作，到了訓政時期都迸發了，於是有十八年冬十九年夏數次中原之役，顯然復返於軍政時代的工作，遷延至於二十年，先之以廣東之變，繼之以九一八之奇恥大辱，不察者遂歸罪於訓政，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羣起要求還政於民。滬上國難救濟會憲政促進會首樹其幟，津沽益世報繼張其詞，但對於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的本身價值若何，則尙未見有否認的言論。

「還政於民」麼？施行憲政麼？這是國民黨自始至終的政治主張，何待他人要求

，老實說罷，國民黨能訓政時，一定要等到訓政以後才能還政於民，才能施行憲政，國民黨不能訓政時，已談不到還政於民和施行憲政了，說到這裏，有人要問我們的態度爲什麼如此，我們的答覆是『這是一個革命的信仰問題。』因爲我們主張訓政，並不如時下一般反對者所斥爲家天下的訓政，爲黨員的利益而訓政，也非如現實的官式的訓政爲個人升官發財而訓政。我們主張的訓政是爲宣傳和推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孫中山先生的一切遺教而訓政，我們的革命信仰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中山先生的一切遺教才是救中國的不二法門。要想中國得救一定要大多數的遵從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中山先生的一切遺教，我們並不主張思想統一於一尊，但我們確希大多數人民要如此思想，因爲在中國大多數人民尙沒有政治思想，所以我們主張訓政，利用這個階級來引導大多數的人民如此思想，使他們得着健全的政治思想，因爲我們的革命信仰是如此。

訓政三年的失敗，我們也承認的，但這不是訓政本身的失敗，其所以失敗則因爲軍政時期工作沒有徹底完成，便一步跨到訓政。以致到了訓政時期還發現軍政時

期的狀態，影響訓政工作未能進行。所以假若有人看見訓政失敗了，便要主張憲政，我們則以爲草率的由軍政進於訓政，致有訓政的失敗，便不可再草率的由訓政進於憲政，致有未來憲政的失敗。

其次，訓政的失敗由於人的亦有，我們應該不諱的承認，國民黨確有些大人物沒有誠意對黨，沒有誠心訓政，只是想藉黨和訓政以把持祿位，永遠想着做黨官。但是我們豈可因噎廢食，因爲人的關係便推翻訓政制度。我們應該問一問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中山先生的一切遺教應否遵從。假若應該遵從便仍需要訓政。至於黨內的糾紛，黨官之不肖，雖足以妨礙訓政；但這是可以糾正，可以改革的。雖然黨外有人借此推翻訓政，而黨內的革命同志反於此對於訓政有進一步的認識，有進一步促成的決心。

我們呼着黨權高於一切，以黨治國的口號，他的真實意是中山主義高於一切，現在中國應以，中山先生主義治國，中山主義才是中國到憲政的唯一坦途。現在反對訓政，要求憲政的人，無論他是憲政促進者，國家主義者，在他們未能否認，中

山主義的偉大時，未能否認，中山主義應為中國政治思想中心時，他們的反對只是隔鞋搔癢，吠影吠聲而已。所以天津大公報說得最為一針見血，他說『吾人主張國民黨速開放政治，與各界有志者澈底合作，而不贊成制度萬能論，專以推翻現制，恢復過去形式的立憲為國民運動之目標，……今日中國所需要之政府，為集中全國之道德智慧胆力，而同時有擴大權限，能臨機處置之政府，一切繁冗之組織，空虛之制度，皆所不宜，不然，訓政固失敗，憲政亦徒然。』此大公報之言，實天下之公言。

主張中國即日施行憲政的人們的最大理由是根據『試驗得經驗，經驗求進步』之說，他們認定前此中國憲政一切弊端，是憲政進步上必經的過程，中國前此憲政上的失敗，其責任不在憲政的本身，而在一班執政權者對憲政無誠意，所以現在要讓人民從憲政做起，讓人民在憲政上做試驗，實驗上得經驗，經驗上求進步。這種政治上的實驗主義假若有人拿來做準繩，那末過去憲政上的失敗，其責任固然不在憲政的本身，但是現在訓政上的失敗，其責任難道又在訓政的本身麼？十幾年憲政

試驗的失敗不算什麼，還要歸本還原，三年來訓政試驗的失敗，又算什麼，便一定要改絃易轍呢。

主張中國即日施行憲政的人們一定又要說，憲政可以實現政治上的實驗主義，而訓政則不能，這是我們萬萬不能承認的，我們以爲訓政是憲政的起頭，訓政時期的地方自治才是人民真實參政的場合。惟有地方自治才使人民有參政的興趣和機會，惟有地方自治才能實現政治上的實驗主義。所謂憲政之治不過立憲法，選議員，組國會而已。這樣便算「還政於民」麼？人民能真正參政麼？中國十幾年的憲政試驗告訴我們的不算。歐美百數十年的憲政歷史告訴我們的，在他們國家裏享有政權的也不過是少數資產階級而已，何曾還政於民！真正人民何曾參政，現在主張即日施行憲政的人們以爲現在國民黨把政權交給憲政促進者，國家主義者便算還政於民麼？國民黨主張以國民革命達到全民政治，黨軍苦戰三年，從軍閥手裏把政權奪取了過來，滿想經過訓政，把政權交還人民，實行全民政治。憲政促進者算什麼，國家主義者算什麼，他們究憑什麼力量要乘火打劫，老實說罷，國民黨能訓政時，一

定要等到訓政以後，才能還政於民，才能施行憲政，國民黨不能訓政時，已談不到還政於民和施行憲政了。

二一，二，九於花園宮。

我們需要一個實際負責領導革命的領袖

——總理六十七週誕辰紀念寫作——

胡夢華

今天是總理六十七週誕辰，舉國一致紀念慶祝，這在我們黨人看來是應該的，而黨外人也許另有議論，尤其是在目前國難嚴重的時候。但是我們以為紀念總理誕辰，是應該的，只看總理平生的著作，——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實業計劃，建國大綱，便是使總理在古今中外學術界佔有不朽的地位。說到這裏，黨外人也許又以爲總理不過是古今中外萬千學者之一，不過像孔二先生或馬克斯一樣。我們也以爲一個學者的權威，不過是建築在一部分學術界或智識階級上面，而總理值得崇拜紀念的地方，除此以外，還因爲他是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創造者。那就是說先有我們的總理，而後有我們的黨，而後有我們的國，而後有我們的國民革命。這才是我們今天紀念總理誕辰的重要意義。

我們看一看近百年的中國史，前乎總理有太平天國運動，與總理同時的有戊戌

康梁維新運動，但是最後成功的只有總理的國民革命，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且把太平天國運動和康梁維新運動二者拿來和總理的國民革命比較研究一下，平心而論，太平天國運動未嘗沒有民族意識，但是可惜，他的中心思想，被個人主義支配了，他們中洪秀全因要做天王，楊秀清以下，也無不想做天王，他們中間，只有個人的私爭，沒有民族的利益，沒有民衆的利益，結果，各個都被擊破，同歸於盡，所以太平天國的失敗，自有其必然性，並完全不是曾國藩打仗的功勞。其次康梁維新運動，主張君主立憲，不過替當時士大夫階級搶飯碗，個人主義色彩特別濃厚，自然也不免於失敗。所以我們總括說一句，太平天國和康梁維新運動失敗的最大原因是由於他們的思想是個人主義性的。換過來說，總理革命所以成功，因為他們的思想是社會主義性的，是以整個民族，民衆，民生的利益為利益，而絕對不許有個人利益的。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便有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實業計劃，建國大綱，成了他和他所領導的黨過去數十年和將來致力革命的南針。但是總理何以能創造這種思想呢？——這是有歷史性的。

我們翻開近百年的世界史，前乎總理誕辰二十餘年有歐洲產業革命的成功，前乎總理誕辰三年有太平天國的失敗。產業革命成功，西洋資本主義一日千里，由工業資本階段而進為金融資本階段而形成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形態。太平天國失敗，曾國藩所領導的士大夫階級一日千里，歌頌君王聖明，欺壓平民，無道專制。所以從總理的童年到成年以至於晚年，他眼中的中國，因為國際帝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在鄉村則農村破產，農民流為兵匪，兵匪造成軍閥；在都市則扶植起一般買辦階級壓榨國民，洋貨充斥，金貨外溢，國民經濟，完全破產。同時士大夫階級的抬頭，在都市為豪紳名流，在鄉村為豪紳豪霸，憧憬權利，把持地方，假冒為善，無惡不作。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士大夫，豪紳，等等這樣呈現於總理眼前，由童年到成年以至晚年，便使他決定了他的革命方向，三民主義的革命方向。這是我們今天紀念總理誕辰應該認識的第一點。

但是徒有理論學說而沒有行動，革命也不會成功的，於是總理又手造中國國民黨——中國的第一個政黨，革命的政黨。有了總理，有了主義；有了黨，所以才有

中華民國。此間，繫於總理判生存者更有中華革命黨之復興，陳英士先生推崇總理爲唯一領袖，又有十三年改組的成功，使總理爲全黨唯一領袖。這樣全黨有了一個中心，所以那時容共，聯俄等政策行之無不成功，後來北伐勝利亦無非由於總理之爲唯一領袖之餘蔭。這是我們今天紀念總理誕辰應該認識的第二點。

但是總理逝世已有數年，總理名詞又經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存其名以垂永久紀念，這樣黨便沒有了實際領導革命的唯一領袖。假若在中央負責的中央委員來去不定，那麼、黨便不免失了中心。在以黨治的訓政時期，黨沒有中心，政治便也連帶失了重心。結果，外交國防，軍事，法治以至於教育，前後都不能一貫；影響於政治便不免着着失敗，而國難如此嚴重也許因此。

同時，一個政黨是不能沒有一個領袖的，歐美政黨固然，蘇俄意大利各黨亦無不然。假若一個黨沒有一個領袖，則幹部分裂，黨員悞徨。黨內便會發生許多不好的現象。甚至沒有一個人負責，變成俗語說的『三個和尚沒水吃』，大家都不能完全負責。所以今天我們紀念總理，覺得黨裏需要一個實際領導革命的領袖。這個領

袖與總理並不抵觸。因為總理是黨的創造者，手訂主義政綱，凡屬黨人皆應遵從，不得變易絲毫。總理是我們的黨之上，而實際領導革命的領袖利奉行總理手訂的主義政綱，督促黨人求其實現。所以我們的口號是一個總理，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實際領導革命的領袖，一個幹部，一個意志統一的黨員羣衆。這是我紀念總理誕辰聯帶的感想。還請大家批評指教

二十一，十二，十一，

三民主義共和國之意義

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已在製定審核中；這與國家政綱政策是最有關的。憲法內容雖不無可討論之處，然大致妥善，並能依國情與時代之需要，發揮建國的精神。憲法原文第一條「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即最足表現此等建國的精神。而論者不然，竟有人說：

「一班起草員或者都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或者認定三民主義為世界上最完善且最適合於今日中國的主義。這種見解，我們不斷定是錯誤。然而這種見解是主觀的。我們要認清事實，今日三民主義的信徒，在中國全體國民中不過百分或千份之一。除三民主義的信徒外，國民中尚有共產黨信徒，國家主義黨信徒，國家社會主義黨信徒等等。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他們不是信仰三民主義者。這一班政治見解不同的人，怎肯接受一種明白規定「三民主義共和國」的憲法？誠如此，國民大會開會時，主義問題，即成爲採用這個憲法的第一重難關，國民黨果自信可以維持這個

三民主義的綱法，今後政治集團違背三民主義即不許組織，今後政治信仰違背三民主義即缺乏自由；如此，則開放黨治，不止欺人，實爲多事。國民黨倘意不在此，且自信不能有此維持永久黨治的力量，將來政治上的信仰，言論都可自由，關於政治的組織都可自由，則此日以三民主義開端，以三民主義布局的憲法，實不啻自掘墳墓」（見二十二年六月十日益世報社評）

又有人以爲中國之有憲法草案不止一次，如二年天壇草案，八年修正憲法草案，十二年賄選憲法俱稱「中華民國永遠爲統一民主國」，且以主義列入團體，在歐美亦不多見。以上諸說皆強烈反對「三民主義共和國」，其言似辯，其實不然，而其錯誤有三：

- 一，未能認清憲法爲革命和歷史的產物；
- 二，未能貫通三民主義與中華民國建國的聯鎖關係，
- 三，未能認識國民黨眞精神。

反之，若對於憲法是革命和歷史的產物的意義有深刻的認識，並洞知三民主義

和中華民國建國的聯鎖關係和國民黨的真精神，一定不會反對三民主義共和國。

一，憲法是革命和歷史的產物 憲法是革命的產物，革命則因時代環境需要而表現不同。在某種時代環境之下。需要某種革命，因而產生某種憲法；故其憲法之成形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而經過革命以後產生的憲法始具有真實性。這種憲法只有革命者的利益，沒有反革命者或不革命者的利益，尤屬必然。所以英國的『權利要求』，法國的『人權宣言』有了中產階級的利益，便對銷了君主和貴族地主的利益。俄國革命後的憲法只有工農兵蘇維埃的利益，便抹殺了資產階級及其他一切人士的利益。因為當年英國參加「權利要求」和法國參加「人權宣言」的人們是中產階級，所以才有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憲法。因為當年俄國參加革命的人們是工農兵蘇維埃，所以才有無產階級的政治和憲法。一種政治和憲法一定是革命的結果，合於革命需要的政治和憲法才有效用。

中國以前不是沒有憲法，但是那種憲法不是革命的結果，並且不合於革命的需要，所以雖有具文的憲法，並不發生效用。換一句話說，在中國革命是一件事，憲

法文字又是一件事。所以有具文的憲法而不必有憲政，有形式的憲政而不必依照憲法。中國之有成文憲法始於遜清光緒三十四年八月軍機大臣奕劻等上奏之憲法大綱，是即九年預備立憲的藍本，繼有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宣布的十九信條。但是這時候人民所需要的是革命而不是立憲。所以無論梁啟超氏如何筆鋒帶感情，把君主立憲說得天花亂墜，張謇氏如何以識時務自居，把日本伊藤板垣諸人變法維新，國富彊兵的盛業吹得鎮天價響，但在此以前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時候，已經發現吳樾烈士用炸彈反對君憲的信號了。九年預備立憲未成，十九信條宣布已遲，曇花一現的君主立憲醞釀，便隨了遜朝同成陳跡。因為這時代的需要是革命，而不是君主立憲，所以即有具文的憲法和革命不生關係，甚至相反，其結果自然是毀法。革命以後，元年約法，天壇憲草皆不能依照革命利益制訂，至於袁氏約法，賄選憲法更不必談，所以依舊憲法是一回事，實際政治又是一回事。孫中山先生有言：

「試觀元年臨時約法頒布以後，反革命之勢力不惟不因以消滅，反得藉之以肆其惡，終且取臨時約法而毀之。而大多數人民對於臨時約法，初未曾計及其於

本身利害何若。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護法進亦不加喜」。

憲法不和革命發生關係，自然不能左右革命以後的實際政治，更與人民漠不相關。請問如此憲法要牠何用？憲法不是點綴品，憲法是革命者勝利的保障，所以孫中山先生「積十三年痛苦之經驗」毅然宣布革命的憲法——建國大綱，以代替一切不合革命需要的約法和憲法。

這個革命的憲法——建國大綱是實現在三民主義的政治的而不帶經濟意味的具體力案，決定於民國十三年，是十三年以前痛苦經驗的結晶，是十三年以後國民革命奮鬥的南針。在文字形式上，前乎此有同盟會的四綱三序，中經國民黨，和中華革命黨政綱歷史上一貫的發展。後乎此有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和現在的中華民國憲法初稿。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這次發表的憲法開章明義便稱「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是順乎革命的要求和歷史的發展的，換句話說便是革命和歷史的產物。

所謂憲法是歷史的產物，那便是說憲法隨年代一貫生長的。像英國的憲法是從

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到一六二八年的人權說帖，到一六八九年的人權條文。像美國的憲法是從一七七六年十三州宣布獨立宣言及議案，到一七八一年北美十三州同盟約章，到一七八九年聯邦憲法。英美二國憲法是這一貫生長的，所以有條不紊，逐步實施，獲有成效。假若憲法不是歷史的產物，不是隨年代一貫生長的，那便缺乏實施效率，常有更張。像法國的憲法有一七九一年君主立憲制度的代議制憲法，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又制定共和憲法，一七九九年拿破崙時又另訂憲法，一八一四年王政回復，又制有君主憲法之欽定憲法，至一八七五年乃制定民主共和憲法。憲法不隨年代一貫生長，經過便這樣糟。中國過去憲法之失敗，一因不是革命的產物，而另一因則為非歷史的產物。

憲法必須為革命和歷史的產物，已反覆言之。中國之有革命，國民黨人實首倡之。革命形式上的勝利在先為辛亥革命，在後為十五年北伐，又皆為國民黨人努力的結果。凡此世有定論，毋待詞費。而國民黨所揭示之革命旗幟，矢志奮鬥，數十年如一日者則為三民主義。所以三民主義之在中國實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與近

代中國革命同其壽命，比之民國年歲猶長，並將與民國同樣億萬斯年。現在革命爲實現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又如此富有歷史性，則衡以憲法爲革命和歷史的產物之意義，「三民主義共和國」條文之制訂實爲必要。辛亥革命，國民黨人在總理孫中山先生指揮下，爲三民主義效死，前仆後繼，成仁取義者何止萬千。十五年北伐，國民黨人暨黨軍在國民革命總司令蔣介石先生指揮下，爲三民主義效死，前仆後繼，成仁取義者何止萬千。而辛亥以前及辛亥與十五年之間，黨人志士爲三民主義效死，前仆後繼，成仁取義者又何止萬千。世人謂憲法是用血寫成的，則中華民國憲法上豈可沒有血書之「三民主義共和國」字樣。英國憲法必以「權利要求」爲基礎，法國憲法必以「人權宣言」爲基礎，美國憲法必以「獨立宣言」爲基礎，蘇俄憲法必以「勞動階級之權利宣言」爲基礎，則中華民國憲法豈可不以三民主義爲基礎！

二，三民主義與中華民國建國的聯鎖關係，憲法必合建國國情時代的需要。在最初憲法上的最重要問題大概是國體，主權，土地幾項，而關於國體一項則不外民主與君主之差，其立意民主權一項內容隣近，其特色在張民權。歐戰以後，德國威

瑪憲法最先以立國經濟趨向明顯訂入憲法，舉世贊爲憲法之新改革。而蘇俄憲法則逕稱爲「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社會主義四字實於國體區別中，兼有闡明國性之經濟趨向的作用。這是現代憲法第一個特點。其次，歐戰後各弱小民族國家憲法皆具有強明的民族獨立色彩。如愛斯多尼（Estonie）共和國憲法第一條稱「愛斯多尼爲獨立民國」，如芬蘭共和國憲法第一條稱「芬蘭爲一自主之共和國」。如來多尼（Lettonie）共和國憲法第一條稱「來多尼爲獨立民主共和國」。如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一條稱「立陶宛爲獨立民主共和國。」捷克共和國公布憲法之宣言有「我捷克國民並宣言願盡吾人全力，俾本憲法及吾國一切法律，得在吾人歷史之精神中，并在「自決自主」成語所包含的近代主義之精神中適用」。我們看了以上各國憲法中獨立自主，自決自主等字樣，可見現代憲法第二個特點。這兩個特點——經濟趨向和民族自主，合之以往憲法擴張民權一點實爲現代憲法應具之三大精神。

擴張民權是法國革命時代建國的要求，這種要求至今百餘年勿替，所以各國憲

法莫不於民權一點特別注意。但至俄國革命時代則另於民權革命以外，別示經濟革命之建國需要，而民族自決自主則為歐戰前後弱小民族國家要求建國之原則。以上三者，分言之，各有其建國時代國情的背景；合言之，則皆合現時中國建國時代國情之需要。故現時中國憲法創制不應墨守成章，以擴張民權為已足，並宜兼有經濟趨向之決定與民族自主之精神。易言之即須有法國革命式，我國革命式及弱小民族國家革命式憲法之長，而「三民主義共和國」條文實於此三式之精義兼而有之。

中華民國承數千年帝室專制與封建勢力之後，現在建國之初，需要法國革命式之民權精神不成問題。而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較之法國革命式之民權思想尤為切合中國建國時代國情的需要。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重在國家謀團結，造成有組織的民國。那就是說要限制個人自由為國家民族謀自由。「所以中山先生每一次講三民主義的時候，一定要反覆講明個人自由是有害於國家的生存，有害於民族的團結和社會文明的進步。要把這衰弱不堪，一盤散沙的中國，從次殖民地地位救轉來，必定人民犧牲自由，一德一心，造成組織嚴密，號令統一的堅固團體才可以達到

目的。」所以在現時中國提倡民權，民主，一定要合乎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才可以建國。

現時中國建國需要俄國革命式的經濟決策精神也不成問題。而此經濟決策之趨向應如何則殊堪研究。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的矛盾現象中，中國的經濟決策只有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一個途徑。民生主義是非資本主義的，而自土地問題立場之例言，由平均地權到耕者有其田，又和共產主義的手段不同。如此決策，一方表示中國經濟建設爲非資本主義的，可免階級鬥爭，勞資對抗。一方表示中國經濟建設無需經過共產主義之大破壞大暴動的恐怖階段。民生主義是爲國民生產謀團結，造成有組織的國民經濟，其趨向遠大而完美，其過程中和而切實。所以在現時中國要解決經濟問題，一定要採行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才能建國。

現時中國建國需要弱小民族國家革命式的民族自主精神更不成問題。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即完全與此旨符合。孫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即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以現時中國要求民族自主，只有繼續努力，以求實現三民主義之民

族主義；而離乎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亦無以建國。

中華民國建國既需要法國革命式的民權精神，俄國革命式的經濟決策精神，和弱小民族國家的民族自主精神，則中華民國不應僅如法國之稱爲民主共和國，蘇俄之稱爲社會主義共和國，或芬蘭等弱小民族國家之稱爲獨立共和國或自主共和國；則憲法初稿名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乃最符合中華民國建國的精神。

三，國民黨之真精神 三民主義的行動組織是國民黨，反對三民主義共和國名稱的人們便以爲這是國民黨家天下的私意。其實不然；先有三民主義，而後才有國民黨，可見三民主義非國民黨所得而私。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由三民主義形成的行動組織的國民黨不過是救國主義的實行者，所謂以黨治國，以黨訓政只是貫徹救國主義，努力促成救國的三民主義的中心信仰，爲中國政治樹立千百年的基礎。所以國民黨之取得政權，實志在授政權於誓行三民主義的民衆。我人嘗論國民黨之真精神有四種特殊黨性：

1. 黨的服役性 因爲勵行黨治的結果，敵派遂加國民黨以「永久專政」的惡名

，而不察黨治的最大和最後的目的是全民政治。——所謂黨治不過是過程的設施。——和完全犧牲的服役。在帝國主義蹂躪之下，軍閥割據和民智幼稚的中國，要想自救，先得把國家統一起來，人民四權訓練好。這工作叫誰去做，並且有誰能做呢？那自然要有素養，有訓練的黨。這個黨最初爲統一國家和訓練人民起見，集中權力，以求實施，當然可行。假若等到國家已經統一，人民已受訓練以後，而猶緊握權力，不交還給國民，那才是真正的永久專政。總理孫中山先生看得很清楚定了以黨建國和以黨治國的主張，把建設的程序分爲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軍政和訓政兩個時期中，一切權力都應屬於黨。由黨來統一軍事政治，統一中央和地方，統一全國訓練人民，指導人民。等到訓政時期的工作完成以後，三民主義的五權憲法實現，那便是憲政時期的開始。這時候四家早經統一，民智亦已啓發，一切都上了軌道，政權即應還給全體國民。所謂一切權力屬於黨，却是一切權力屬於國民了。所以仇視國民黨主張的人，且慢盲詆本黨是專政：看清底裏，還得體念國民黨長時期服役的犧牲和辛苦。再看看歐美政黨怎樣？有誰肯這樣服役而成功不居？一部歐

美政黨政治史，除掉告訴人們惡狠的黨爭，只謀私人的權利外，當最後的勝利已操左券的時候，也肯公之於全體國民麼？不爭最後的擅樞，惟求政柄的公開；以黨治爲工具，以全民政治爲目的，這是何等偉大的器度和卓越政治眼光。這是國民黨特殊黨性的第一點。

2. 黨的革命性 中國八十年來深受帝國主義者的宰割，朝野一切，不是被帝國主義者所鎮服，就是被牠所軟化；這時改造中國的方略，不應爲改良，而必爲革命，然後中國才有澈底解放的希望。所以本黨以一切被帝國主義者壓迫的民衆爲基礎，爲這些民衆的解放，而向帝國主義者和牠的工具奮鬥。在這裏顯然可以看出國民黨革命性的三大特點。第一，國民黨是爲民衆而革命的；假若事實上，中國民衆不需要革命，國民黨即未必有組織。假若國民黨丟開了民衆，或民衆離棄了國民黨，則亦無需國民黨。第二，國民黨是以帝國主義者爲革命的對象的；帝國主義者一天不打倒，國民黨革命的使命即一日未了。假若國民黨革命成功以後，中國也慢慢地走上帝國主義者的途徑，是國民黨已自絕於革命，則國民黨已根本破產。第三，國

民黨是主張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的，那些帝國主義者的工具的勢力，自然要打倒，而憲法才能實現。假若國民黨中途和其他政治勢力調和，是已誤入於改良的歧途，而忘記了本來的革命真面目。綜觀之，國民黨的革命性是絕對的剛性的，一有遷就或假借，便失却本來的真意義，而亦惟具有如此的剛性，國民黨的革命性乃得保存，而始終奮鬥到底。所以爲別於普通的政黨，國民黨可稱爲革命的政黨。再看：歐美的政黨怎樣，天然處於帝主義的環境中，本身即賦有濃厚的帝國主義色彩，而甘爲帝國主義的爲工具，民衆早已置之腦後。又爲延長政黨的本身生命計，主張妥協調和，以圖苟存，漫無標準，徒因利害而妥協，甚至忘却其黨的主張以遷就他派的意見。於是有所謂議會，就是他們買賣權利的場所，私相授受，而美其名爲政治的手段，黨派之鬥爭，政權的遞嬗，即基於此。此等事實，徒滋糾紛，無補革命；不幸而發生於次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國家，不過增加一些帝國主義挑撥和利用的機會，而益陷國家於危亡。所以國民黨毅然以革命的手段，掃除一切政黨，使政權統集於一精密博大的黨治下，以貫徹三民主義，而謀澈底的革命的建設。——這便是

國民黨特殊黨性的第二點。

3. 黨的全民性 在帝國主義者宰割之下，中國被壓迫的民衆，天然是多階級的，所以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主張各階級合作，爲共同的民族利益而奮鬥，以期打倒帝國主義。同時關於各個階級的特殊目標，亦兼顧及，以期調節；但不主張階級鬥爭，以遂一階級的專欲。因爲在次殖民地的中國，各階級的民衆所受壓迫雖有輕重的區別，而同受壓迫則一。目前在中國需要解放者，固以農工爲最迫切，而其他各階級所感受痛苦，却也未嘗稍減。所以國民黨的革命主張，雖以大多數的農工利益爲基礎，而對於其他各階級的利益亦極尊重。且在次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國家，全國民衆應念救亡未遑，義無內訌，宜團結內部，一致對外，以爭民族之生存；而不可分疆立界，專務內爭，以遂階級利益之私圖。所以在可能的範圍以內應竭謀弭階級鬥爭的病的狀態。國民黨集合各階級的民衆，以赴同一的國民革命戰線，自然爲的是代表這些全體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再看歐美的政黨怎樣？牠們不是代表一階級的利益，就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某黨當政，國家的政權即成爲某黨的私

。得到他們的利益的不過是他們所代表的一階級或一部份人，而他黨所代表的一階級或一部份人的利益則受忽視。英國保守黨，自由黨和勞工黨，以及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對於牠們敵派的措施，蘇俄波爾希維克對於資產階級和反對派的措施，其陰險毒狠，可謂極人間之能事。私而不公，僅以一階級或一部份人的利益為前提，所以歐美政黨循環報復，迭相起伏。公而無私，以各階級的全體民衆的利益為前提，國民黨所以勵行以黨治國——這便是國民黨特殊黨性的第三點。

4. 黨的平等性 人類生存的最高目的在求自由平等，國民黨三民主義即始終為民族，民權，民生的自由平等而革命。總理孫中山先生有一句歡喜說的話——「天下為公，」藉此可見自由平等的精神實公之黨外和世界而無岐視。黨員和非黨員的立腳點便是平等的。黨部是以黨員為基礎，而一般民衆團體，則兼容黨員和非黨員。在社會上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再看看歐美的政黨怎樣？國際間政黨的裨闡縱橫和聯盟協約幾無不以壓迫和吞併弱小民族為能事。蘇俄波爾希維克日以「聯合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世界革命」等口號相號召，而最近事實上的證明，終亦

不免爲帝國主義者。此蓋共產主義本來具有帝國主義的色素。至於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則不然。黨的基本觀念是「仁」，這種中國固有的道德——「仁」是三民主義的出發點，也就是他的歸宿點。仁者愛人：——所以總理孫中先生平博愛二字不絕於口：又常言「革命由於愛人。」所以在愛人的三民主義旗幟之下，斷不容有侵略的行爲，不平等的現象。這便是國民黨特殊黨性的第四點。

約上所言；國民黨之主張以黨治國，自有牠的立腳點，自有牠的新意義；自有牠的相當程序，自有牠的特殊國情；和歐美的政黨政治不同，黨員不能以黨爲私，領袖也不能以黨爲私。以三民主義爲經，以國民革命爲緯；以黨治爲手段，以全民政治爲目的。保持革命的剛性，不妥協，不調和；不以黨爲一階級的武器，不以黨爲侵略的工具；以博愛爲出發點和歸宿點；以自由平等爲最高的原則和最後的目的；這是國民黨的真精神。由這種真精神所見到的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的關係，可以決定三民主義不是國民黨所得而私。而以國民黨爲三民主義之努力，因而得全國人民之擁護，則三民主義共和國更不容被否定。

三民主義之政治方案爲建國大綱。建國大綱明定全國人民必須誓行革命主義，所謂革命主義即三民主義。人民既皆誓行三民主義，則又何能反對三民主義共和國暨三民主義的五權憲法？

領袖獨裁論

類別

3.07
4.5

備註

母數	定價
1	050